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参加开国大典

第十六册



“八一”军旗飘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全军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的命令”，由此标志着我军向统一的正规化革命化道路上迈上了新的一步。

1949年初，党中央根据全国胜利即将到来的新形势，指示解放军总部尽快制定出我军军旗军徽样式，是我军能以统一的军容，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并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在研究设计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听取了设计人员的汇报，并特别指示：军旗上要有“八一”字样和“五星”。因为我们的军队是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中诞生的，“八一”是我军建军纪念日；“红五星”象征着党和共产主义，我军几十年的发展壮大都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取得的，同时也是广大官兵在共产主义信仰旗帜下取得的，因此要有“五星”。周恩来同志也指示：旗子的颜色要以红色为主体，这一方面是我国人民传统喜庆的颜色，同时也象征着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星和字可用黄色。周恩来同志还指出，旗杆要有红黄两色的旋纹，顶部要装一个红缨枪的矛头，饰上红穗，这象征着我们的军队是从人民武装发展而来的。解放军总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多次研究，确定了方案，制作了第一面“八一军旗”，同时制定出了以镶有金黄色边中嵌金黄色“八一”二字的五角红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军旗军徽样式制作好以后，周恩来同志亲自送到毛泽东同志住所，并且详细汇报了制作过程，毛主席十分满意。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向全军颁布了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命令中严格规定了军旗的色彩样式和长短尺寸，并根据军队的不同级别，按总部、野战军、军、师、团等五种大小不同的军旗。同日，新华社发表了《把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中国》的文章。从1951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的军徽定以“八一军徽”为主体，海军军徽藏蓝色底，衬以银灰色铁锚，蓝色象征海洋，铁锚代表舰艇；空军军徽衬以金黄色飞鹰两翼，象征人民空军英勇果敢，飞行无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和海军、空军军徽还用作帽徽图形和飞机、舰艇、坦克等装备上的标志。

军旗军徽样式颁布后，全军迅速兴起一股学习认识军旗军徽意义的热潮，广大官兵将军旗军徽的颁布看作是我军的一个伟大胜利，同时表示要象爱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军旗军徽，并加强练兵，勇敢作战，让“八一军旗”在全中国高高飘扬！

进军西北

在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举行的渡江战役即将胜利结束时，中共中央军委于23日向各野战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部署》，其中规定第1野战军向西北进军，尽可能在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尔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占领新疆，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5省；一路由贺龙率领，协同第2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3省。

西北是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地区，驻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13个军约17万人，其主力集中于陕中及渭河流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马步芳所部、副长官马鸿逵所部8个军约14万人，驻守甘肃、青海、宁夏3

省。此外，新疆还驻有警备司令陶峙岳所部约7万人。总兵力近40万人。中央军委为改变西北战场态势，加速西北解放战争的进程，在第1野战军进军西北之前，于4月25日决定将第18、第19兵团调归第1野战军建制，迅速由晋入陕，参加解放西北的作战。

此间，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胜利渡过长江，第4野战军先遣兵团逼近武汉，第18、第19兵团等部解放太原，全国形势十分有利。在此情况下，胡宗南慑于被歼，开始实行战略退却，从铜川、蒲城、耀县等地后撤，企图与“二马”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迫不得已时则退踞陕南、川北。

第1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得悉胡宗南部全线撤退后，决心不待第18、第19兵团到达，即开始进军陕中，于5月16日至6月17日举行陕中战役，解放陕西省会西安，并击退胡宗南部和“二马”共30多个师20万人的联合反扑，歼敌4万余人，解放漆水河以东广大地区。

陕中解放后，第1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统一的进军部署，和拨归其建制的第18、第19兵团开始实施向西北进军。

胡宗南和“二马”联合反扑受挫后，胡宗南部第18兵团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属第119军退守武功至扶风一线；胡部第36、第90军分别撤至郿县、哑柏镇等地；马步芳部陇东兵团和马鸿逵部宁夏兵团分别退守常宁、眉县（今彬县）、长武、永寿地区。第1野战军决心举行扶眉战役，以第19兵团箝制青、宁“二马”，集中第1、第2、第18兵团歼灭扶风、眉县地区之敌。7月11日，第2兵团迂回敌后，切断胡部退路，第1、第18兵团沿渭河两岸西进，次日将胡军包围，激战4天，于14日胜利结束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个军4.3万余人。胡宗南余部退踞秦岭地区；马步芳部向兰州、西宁地区，马鸿逵部向银川及其以南地区逃跑。

接着，第1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暂不占领汉中，集中兵力歼灭青、宁“二马”的指示，于7月下旬以第18兵团于西安、宝鸡一线箝制胡宗南部，以第1、第2、第19兵团乘胜向陇东地区展开追击，连克平凉、固原、海原及天水、武山等地，歼灭“二马”部1.1万余人，造成了进军兰州、银川的有利态势。

马步芳为确保兰州，以主力5万余人防守城区，以一部兵力及马鸿逵部1个军防守兰州外围，保障兰州东西两翼的安全。为歼灭马步芳部，第1野战军集中第2、第19兵团于8月21日发起兰州战役，经过激战，26日解放兰州。第1兵团于临洮、临夏等地歼灭马部新编骑兵军后，挺进青海，9月5日占领西宁。此役共歼敌4.2万余人，马步芳部基本被歼。

兰州战役后，第1野战军主力兵分两路，北征宁夏，西取河西。9月2日，第19兵团奉命进军宁夏。宁夏马鸿逵部新编骑兵第1旅和第81、第128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先后宣布起义或投诚，其余被歼。9月23日，银川解放。此时，沿河西走廊追歼向张掖、玉门逃窜之敌的第2兵团和第1兵团第2军经过长途跋涉，相继占领武威、永昌、山丹等地，17天挺进700多公里，所向披靡，国民党军纷纷投诚或起义。9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属全部在酒泉起义，河西地区追击战遂告结束。连同宁夏战役，被歼和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共8万余人。至此，甘肃、青海、宁夏3省获得解放。12月，第18兵团挺进陕南、陇西。

陕、甘、宁、青4省的解放，打开了进军新疆的大门。在人民解放军胜

利进军形势的影响下，国民党军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于9月25日、26日宣布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为及时接管新疆地区，第1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王震率第2、第6军于10月10日起，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3种方式，向天山南北挺进。11月6日，第1兵团指挥机关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12月下旬，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任政治委员。进军新疆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在新疆民族军的接应下，至1950年3月，胜利完成进军新疆的任务。至此，第1野战军向西北的战略进军胜利结束。

第1野战军在进军西北的10个月中，共歼灭国民党军30余万人，取得了解放陕、甘、宁、青、新5省的重大胜利。

计他带罪立功

1949年7月，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向福建进军。那时候，在重峦叠峰的闽北山区，蒋军残匪多如牛毛。当我军胜利逼进时，这些残匪如惊弓之鸟，有的闻风而逃，有的则摇身一变佯称“人民游击队”，浑水摸鱼，妄图潜伏下来，继续与人民为敌。

一天，九十一师刚进入蒲城县境，就得到当地群众报告：在该县的石陂街镇上出现了一股打着“蒲城人民游击队”旗号的残匪队伍，肆意打骂群众，进行抢夺，无恶不作。师首长当即命令二七三团马上派一个连去消灭这伙残匪，以保护人民利益，并借此开展宣传工作，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深入发动群众。

执行这个任务的是“爱民遵纪模范”第八连。他们借夜色突然包围了石陂街镇，一举消灭了这股残匪。为了不让一个匪徒漏网，第二天凌晨，连队派出几个战斗小组，进入镇内搜索。

山东籍的副班长陈金庭，眼看一个手持砍刀的中年男子慌慌张张地窜到一个院落里，便紧紧尾追进去，用浓重的山东口音高喊：“你是干什么的？”那人没有回答，再喊一遍，还是不予理睬，于是又大声命令他：“快放下刀，举起手来！”那人却手持砍刀，迎面而来。这时刻，陈金庭根本没有意识到对方是否能听懂自己的话，只是凭直觉判断这人是匪徒，便开枪射击，打死了他。

事后，才知道死者是一个靠砍柴为生的贫苦农民，而不是匪兵，许多镇民也作了旁证。

战士陈金庭误杀群众，犯罪了！

为了挽回我军进入新区的影响，严肃军纪，师部成立临时军事法庭，判处陈金庭以死刑。

那是个阴云低垂的日子，8连的干部战士都低头不语，摆着一张张表情十分难过的面孔。连长和指导员代表全连再一次去探望即将永别的战友，问陈金庭还有什么话要留下？他的远在胶东半岛上的父母双亲有些什么事要照管？陈金庭抬起了头，他说：“我是个解放军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没有执行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新区政策，犯了军纪军法，受这样处分是应该的。我愿以自己的生命，来挽回党和部队的影响！……”说到这里，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过了一会儿，他伸手从军衣口袋里掏出仅有的一元浸透汗渍的纸币交给指导员，含着泪花说：“我对不起党！请代我交给组织最后一

次党费吧！”

上午，公审大会在石陂镇举行。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闻讯赶来参加。

大会开始后，首先由师副政委丁剑以军事法庭的名义宣读判决书。当他讲到陈金庭是胶东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土改翻身后自愿参军，一直作战勇敢，多次流血负伤，为人民立过战功的经历时，全场不再沉默了，开始有人高喊起来：“不能让这个好战士死！”接着是一片呼喊声：“不要杀他！”“不要杀他！”

宣判被打断了。

任凭大会主持者用大喇叭筒怎样呼喊：“请大家平静！平静！”也无济于事。许多群众站起来了，向主席台拥来。

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医生挤出人群，快步登上主席台，连连向部队首长作揖，恳求说：“我代表全镇的乡亲们，要求不能杀这个大军同志！他是个好人哪，是从山东来解救我们福建百姓的呀……”老医生泣不成声。

死者的母亲林阿婆也走上台来，她擦干了眼泪，面向大家说：“我的儿子不是大军有意打死的。解放大军是毛主席的队伍，和从前的红军一样，爱护咱百姓的呀。现在，我的儿子已经死了，不能再让咱队伍死一个好大军！”说到这里，她转身双膝跪下，恳求部队首长答应把陈金庭作为她的“干儿子”留他一条命，好让他消灭反动派。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支援大军，解放福建！”

公审大会变成了军民誓师大会。

会后，军事法庭根据人民群众和死者家属的强烈要求，重新作出判决：免除陈金庭死刑，让他在解放福建的战斗中带罪立功！

战士陈金庭，决心不负人民的养育和救命之恩，又重新回到战斗行列中……

一次叛逃事件的解决

1949年初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和第2野战军第4兵团，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统治的中南地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慑于解放军强大攻势，率部起义，起义部队被编入第4野战军第21兵团。上级派四野第58军政委方正平带一个工作团去做这支起义军的改造工作。

工作团向起义部队每个基层连队派了解放军代表，遵照我们党的“团结上层，争取下层”的方针，迅速展开了工作。但要把这么多起义官兵都很快改造过来，任务是很重的，不但要慎重把握政策尺度，还得十分注意工作方法。一天，一名代表向方正平报告：起义军队中的一个连长，因不愿受解放军的制度和纪律约束，正在策动连里的士兵叛逃，要带着这些人到山里去当土匪。方正平很重视这件事，他明白，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会出大问题的。

他仔细向代表了解情况后，代表提议说：“这个连长策划叛逃，现在就是我们的敌人，我去派人马上把他抓起来。”方正平说：“不能抓，要从正面做教育争取工作。”他讲了自己的处理意见：现在起义部队编入解放军时间不长，改造工作才刚开始，起义官兵对我们的政策还不十分了解，特别是

一些军官思想不稳定，要是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连长抓起来，会在起义部队中引起波动，有可能会出大乱子，不利于我们的改造工作。除非万不得已，不要抓人，要立即发动连里反对叛逃的士兵掌握连长动向，制定严密的防范措施，一定要避免叛逃成为事实。要向这个连长阐明利害，交待我们党的政策，指明出路。同他讲清楚，现在全国虽然还没有全部解放，但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人民政权；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奈何不了共产党和解放军，他带那么几个人上山当土匪有什么前途，只会落得可悲的下场！

代表按方正平的意见稳妥地解决了这个叛逃事件，这个连长明白了利害关系以后，对自己的愚蠢做法十分后悔，表示一定要带罪立功，痛改前非，坚决跟着共产党和解放军走到底。

巧设机关擒车正

1949年7月初，我44军157师471团政治委员李彦龄，奉命率本团第3营配属师属电台1部，赴湘鄂边的修水、铜鼓两县剿匪建政，并收编修水民主自卫军。修铜地区此时的匪情很是严重，最大的股匪是湘鄂赣反共救国军第6总队。匪首车正，修水县南茶车村人，黄埔军校毕业，曾在国民党正规部队中任少将旅长，颇有些带兵作战的实际经验。我军过江前夕，他返回故里，收集散兵游勇、土豪武装，扩充实力，图谋就地坚持，待机再起。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车正凭借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又得到省府的支持，使修铜地区的反动分子很快地麇集到他的周围，不长的时间就拼凑了3个团和几个独立大队，共约2000余人。在我大军过境时，为避我军锋芒，匪首车正下令分散潜伏，等待时机。我军主力南进后，他们认为时机到来，便蠢蠢欲动，扬言首先攻下修水县城。

李彦龄派鲁副营长带11连向修铜边境进剿。他们随即摸到车匪第3团的一部，上午袭击，一举奏效，俘匪20余，并活捉了团长帅侠群，因部队急于追歼逃敌，又让帅溜进森林逃掉了。部队冒暑追击，翻过几个山头，中暑20余人，只好停止追击。

为歼灭车正股匪于尚未集中之际，8月上旬，工委派副营长鲁殿英、副教导员马作元带第9连前往铜鼓剿匪，并掩护建政。团政委李彦龄和教导员高维学带第10连、11连和独立连一部前往三都和南茶车村一带进剿。

部队于子夜出发乘船顺修河东下40里，拂晓上岸袭击三都之匪，很快打掉车匪第2团的1个连，俘匪19名，缴枪20余支。据俘虏供称：匪第2团已东窜武宁境内，匪首车正率直属大队及第1团分散隐蔽在修水与通山交界的易溪坑，和南茶车村一带。

“擒贼先擒王”，部队吃过早饭奔袭易溪坑。指战员们冒暑行军30余里，正午赶到易溪坑，却扑了个空。下午3时，奔袭车正的老窝南茶车村，在村内村外严密搜索，未发现敌人。

次日，李政委他们派出工作组进行访贫问苦，宣传群众，了解匪情。经过调查得知，车正就在附近，并不断回家，住与不住，变化无常。另据他属下一名投降的营长说，车正就隐藏在离此不远的山沟里。

当天下午，李彦龄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分析匪情，认为进山搜剿不易奏效，因为车正人地两熟，耳目众多，且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我军在明处，他在暗处，搞不好还会吃亏。不如调虎离山，设计擒拿。当即决定由10连完

成这一任务，具体部署是：

部队撤往修水，估计车正会回家来察看动静，再由第 10 连指导员王福祿，带几个战斗小组星夜返回在南茶车村周围设伏；由连长李绪生带 1 个排于次日清晨反扑南茶车村，采用哄兔子撞网的办法，先把车正惊起，当他逃跑时，在村外设伏点捕捉他。

第 3 天上午，我军继续在南茶车村宣传和发动群众。下午 3 时，部队集合离开车村，奔向返回县城的途程。走了 20 里到达上杭宿营，并立即设岗布哨封锁消息。

第 10 连依计行事，但却扑了个空，返回上杭。又休息了一夜。

这一夜，有个问题总在李彦龄的脑子里翻腾，是车正没有回家呢？还是我军“杀回马枪”时他隐藏起来了呢？李彦龄决心再杀一次“回马枪”。这次拉得远点，把部队撤回修水县城。然后派一个认识他的人，带 1 个小分队神不知鬼不觉的闯入他家去捕捉他。

李彦龄想到了新编的独立连长戴亚云。此人是国民党特务训练班的毕业生，曾在车正部下当过参谋，因有某些矛盾，他没跟车正干，而投了民主自卫军。自卫军被改编时，自卫军领导人推荐他当了个连的连长。李彦龄想利用他人地两熟且认识车正的有利条件。为了稳妥起见，李彦龄听取了原团政治处保卫干事、现任该连指导员满庆云的意见，并把他带去改编这个连的骨干抽出 1 个排长 2 个班长随行，以加强这个小分队的战斗力量。为防止得而复失，李彦龄又派第 10 连指导员王福祿带 1 个排在村口接应掩护。

22 日上午，部队离开上杭，东行 20 里到达杭口，停止休息，在这里作了战斗部署，一切就绪，下午 3 时许，起程把部队拉回县城，只留下执行任务的小分队。

23 日，夕阳西沉时，戴亚云的小分队押着 2 个俘虏回来了，10 连指导员王福祿也随之而来，戴亚云兴致勃勃地说：

“报告政委，我们把车正和他的副官抓来了！”

“好！怎么抓到的？”李彦龄欣喜地问。

戴亚云报告说：

“我们拂晓前包围了车正的家，我去敲门，车正的副官拿着这支枪（一支崭新的左轮）来开门，门一开我们的班长就用冲锋枪逼上了他，下了他的枪。我们立即冲进车正的卧室，发现床上没人，就到阁楼上去搜索，从禾筒里把他揪出来了，1 排长立即把他扭走，我收拢小分队还未出村，后边枪就响起来了。”

李彦龄问车正：

“什么人打枪？”

车正慌忙回答说：

“是睡在我家隔壁的几个随从。”

戴亚云接着说：

“我们刚到村口，王指导员要我们先走，他打掩护，我们就这样上路了。”

王福祿报告说：

“我们多想把村里的土匪消灭啊，可是天亮了，敌人未必敢露头，情况不明，我们也就撤下来了。”

李彦龄表扬他们说：

“你们辛苦了，任务完成得很好，赶快回去休息！”

活捉车正之后，我军趁群匪无首，发生动摇之机，采取军事进剿与政治瓦解双重攻势，扩大战果。一方面分兵掩护地方干部建政筹粮支前，另一方面组织军事进剿及收缴散匪的武器，并广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真是树倒猢猻散，匪首车正被捉，加速了该股土匪的灭亡，不少土匪主动来降。

车正虽然思想反动，老奸巨滑，但并不顽固死硬，他意识到大势已去，为了活命，与我军在某些方面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找他谈话时，他先问：林司令好（指林彪）、陈司令（指陈奇涵）好？以标榜他们都是黄埔的同学。他供出了埋藏的武器，起出了装在棺材里的 50 余支崭新的步机枪和手枪。接着，他写了几封劝降信，送出后中小匪首纷纷来降，潜散在修水的第 1 团和几个大队就彻底瓦解了，其第 2 团逃往武宁，第 3 团遭受打击后散布在棋坪山。截至 8 月底，车正股匪在修水、铜鼓两县的残余基本被我军全部消灭了。

绥远和平解放

1949 年 8 月 26 日，一列开往归绥的专列，由北平前门火车站徐徐启动了。站在车门口的傅作义将军和邓宝珊将军，频频向前来送行的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招手致意。傅作义此行是促使绥远和平解放。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率领的第 9 兵团部等 6 万余人驻守归绥、包头地区，处境孤危，上层开始分化。董其武等主张走和平解决的道路，但有些人仍主张向西撤退，极少数人则主张以武力顽抗。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 2 月 22 日接见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的傅作义将军时，与其就如何解决绥远问题进行了商谈。

毛泽东对傅作义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

3 月 5 日，毛泽东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采用和平手段解决绥远问题的“绥远方式”，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争取其在政治上站在革命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首先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主要部分，在一段时间后再将暂时保留的国民党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党中央据此方针提出了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各项具体政策，由华北人民政府和傅作义将军互派代表在北平谈判。

之后，经过傅作义将军从中斡旋，双方通过谈判，于 3 月拟定了包括军队划界驻守、平绥铁路通车、在绥远使用人民币和互派联络人员等项内容的《绥远和平协议》草案。经董其武同意后，于 6 月 8 日签字生效。

7 月中旬，华北人民政府组成联络处进驻归绥，协助董其武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此期间，国民党蒋介石为阻止绥远的和平解放，不断派遣人员以威逼利诱、策动哗变、武装检查华北人民政府驻绥办事处等手段，破坏和平协议。

为促使绥远早日和平解放，8 月 26 日，傅作义将军受党中央委托赴绥远协助董其武组织起义。此行带有现洋 20 万元以慰问绥远部队官兵。

在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和我党政策的感召下，董其武排除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种种障碍，准备进行起义之际，已迁移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得知傅作义离北平赴绥远促成起义，便展开了一系列紧张活动。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远的特务：“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让出华北。近闻该逆

潜伏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任务完成，本局当有重赏。”傅作义到达包头后，还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你这次回绥远，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你要接受我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希接电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前来接迎，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还收到代总统李宗仁和阎锡山的“贺电”，庆贺傅“脱险”，邀请其到广州。傅将军对此均一笑了之，搁置一旁，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也不怕阴谋暗害。

经过傅作义将军的不懈努力，董其武率绥远军政各界和各民族代表共 39 人于 9 月 19 日联署通电起义。至此，华北全境获得解放。

随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6、第 37 军和骑兵第 4 师。1950 年 12 月编组成第 23 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

绥远的和平解放，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人民解放军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作用在于使人民解放军能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方面的国民党军。正是由于党中央在华北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式，因而人民解放军能将第 18、第 19 兵团及时转用于西北战场执行更重要的任务，并使绥远兵不血刃地获得解放。

三炮解放南丰城

1949 年 7 月，烈日炎炎，热浪袭人。7 日，我军第 161 师到达南昌。11 日，师直一部率 483 团和 481 团 1 营进驻抚州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部队到抚州后，团领导命 483 团 1 营 1 连、2 连和机炮连配合 481 团 1 营解放南丰；3 连由师副政委邹日晴率领到黎川改编武纪彬部队。这两项任务完成后，立即转入剿匪。

我 483 团 1 营 3 连到黎川时，发现号称千人的武纪彬部队，实际不足 500 人。该部是由民革江西筹委会组织起来的进步武装，经邹副政委与武纪彬协商，将武部改编为 3 个连，编为抚州军分区独立支队。

我 483 团 1 营（欠 3 连）和 481 团 1 营，于 8 月 27 日，只用了 3 发炮弹，就解放了南丰县城。守敌“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第 19 支队李彬部，20 支队曾勋柱部，独立营曾唯部，是一群临时聚集起来的乌合之众，昔日表示要“精诚团结”，而今则闻声各奔东西。李彬带群匪几百人逃往福建省泰宁、建宁山区；曾勋柱、曾唯逃往南丰境内军峰山区与邹富成的 21 支队汇合。这样一来，追剿这几股土匪，就成为我 483 团 1 营此时的主要任务。

9 月初，我 483 团 1 营 3 个步兵连奉命分别从位于武夷山西麓的南丰、黎川出发，进剿李彬和其它股匪。3 连在连长贾元富的带领下，出德胜关后，与李彬股匪一部约 70 余人不期而遇。战斗打响后，土匪见我是主力，来势勇猛，不敢抵抗，就全部缴械投降了。

第 2 天，在寻找残匪中，捉住了一名可疑之人，审问中，他说他是吴勋民（匪第 7 总队）派来与后面 2 中队联系的，让他们快些跟上，1 中队就在前面。此时，我军本应停止前进，就地埋伏，待匪 2 中队上来时，打他个突然袭击，但因担心这个匪徒的口供有诈，决定追歼了 1 中队，再伏击 2 中队。

匪 1 中队要等 2 中队，走得较慢，很快就被 3 连追上，战斗刚打响，匪 2 中队已赶上来。这时，若举措不当，3 连就会被前后夹击，承受重大损失。紧要关头，3 连官兵沉着镇静，同仇敌忾，在贾连长的指挥下，各班迅速抢

占了山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并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

刹时间，我军的枪声，号声和“缴枪不杀”的喊声，响彻山谷。群匪见势，人人惊慌失措，个个畏缩不前。战斗不久，土匪便四下窜逃，钻进了深山密林。我军当场毙匪10人，俘匪60余人，缴枪100余支。3连1名通信员和1名挑夫牺牲，司号员负了轻伤。

时隔几天，我1营1连、2连在建宁与南丰边沿地区甘家隘击溃李彬股匪4个连，俘匪100多人。接着，李彬的副官王坤带50余人和武器弹药一部投降。

李彬、吴勋民股匪，被我1营创巨痛深，便化整为零，逃往泰宁、建宁山区，隐藏形迹，使我军暂时失去了追剿目标。我1营各连奉命返回原防，1连驻南丰傅坊，2连驻泰宁，3连仍驻黎川，营部驻南丰县城。

红旗跃井冈，匪首阶下囚

1949年4月26日，我第4野战军第48军，遵照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4月21日发布的“向全国进军命令”，从北京通州挥师南下。7月上旬进抵南昌、高安一线待命。7月27日奉命解放赣西南地区，打开我军入粤作战的通路。

8月底，我48军赣西南追歼战刚一结束，便接到上级命令：令142师第424团进驻大余县，归军直接指挥，担任大余、崇义、上犹地区的剿匪任务。

原来吉安地区的土匪，是以赣西绥靖司令贺维珍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吉安解放时，他们流窜到赣西山区，企图在湘赣边山区建立“游击基地”，与我军长期对抗。8月初，我军开始进行赣南战役时，第157师乘胜自永新出发，向安福、莲花进剿，消灭了贺维珍的绥靖司令部及其所属的2个保安团，并争取了几支国民党地方部队投降，歼灭了几个小股土匪。尚有大小18股土匪，共4011人，未被消灭。其中人数最多，危害最大，活动最为猖狂的是遂川县肖家壁股，他盘踞在我军尚未进入的井冈山山区。

金秋9月，天高气爽，万里无云，蓝天底下，连绵起伏的罗霄山脉，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我军忘记了渡江以来千里追击的疲劳，遥望着屹立在群山中的一座高峰——巍峨的井冈山，不由得加紧了脚步。

井冈山啊！井冈山，你是革命胜利的起点，红军的摇篮，在你身旁成长的红军又胜利地归来了！

在漫长而艰苦的革命道路上，有无数奇迹的巧合。今天又是一个巧合：我142师前身的一部分，正巧就是坚持过井冈山斗争的红31团的老底子。它是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亲手培养创建的一支红军队伍。20年来，这支铁定的红军队伍，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从梭镖、大刀换成了机枪和大炮，从1个班变成了1个连，1个连变成了1个师、1个军。当年坚持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多数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倒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战场；有的长眠在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有的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疆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红军的老同志，在我142师也不过只3个人了。但是井冈山精神还一直在部队保持发扬着。全师无论新老干部或战士，一踏上奔往井冈山的征途，心里都充满着亲切、温暖和自豪的感情。

可是，当我军步步深入到井冈山山区时，心里又逐渐沉重起来。被反动派糟塌过的村庄，一片凄凉。许多房屋变成了一堆焦黑的废墟，屋框里生长着

几尺深的杂草。只有那一堵堵半截的墙壁上，还模糊地残留着红军时代的标语。

1934年7月，红军离开了井冈山地区，反动恶霸地主肖家壁，带着靖卫团，随国民党军血洗了井冈山。

提到肖家壁，井冈山地区人民痛恨得无不咬牙切齿。他是遂川县东北50华里的大坑人，此时50多岁，是遂川县最大的恶霸地主。早在1926年，就任国民党清乡委员会主任，专门镇压农民协会；1929年又任国民党靖卫团团团长，多次率领民防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我工农红军。

在我红军长征后，肖家壁更是疯狂一时，他进入了井冈山，疯狂地叫嚷：“井冈山人要换种，山要过火烧，石头砍三刀！”

井冈山周围40里的村庄都被肖匪带人烧遍。小井、大井、茨坪是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更为重点血洗的地方，大井被烧过4次，小井被烧过13次，小井被烧得到后来只剩下一家中和昌小饭店。井冈山人民称肖家壁是“肖屠夫”、“阎罗王”、“焦面虎”。

肖家壁捉住红军伤病员、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采用剥皮、挖心、活埋、点天灯等令人发指的残酷手段，施行屠杀。仅在井冈山五大哨口内，被杀害的群众就达1000余人，在大井村一次就集体枪杀130余人。有的被杀后亲人偷偷地将尸体埋葬起来，肖匪又派人扒出，烧掉棺材，将尸体扔在大路旁。一位红军战士的妈妈，被他将腹部破开，说要看看她为什么要生个红军儿子。人民群众陷入了血与火的深渊，井冈山一片焦土，遍土白骨！

我142师向井冈山进军时，军首长交给欧治富师长一个任务：要彻底消灭肖家壁匪部。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活捉肖家壁，不要死的”。

肖家壁十分狡猾，我军进剿时，他不是集中兵力与我对抗，也不固守要点，而是分散兵力，利用井冈山山高、坡陡、沟深、草茂、林密和他们熟悉的地形与我军周旋。他自己也不多带人马，只带2名亲信，隐藏在少有人迹的地方。

为剿灭这群刁钻的土匪，欧治富决定“擒贼先擒王”。

欧治富命令：把井冈山四周的大道小路，全部封锁死，部队分散向山里搜剿。同时，请地方党的同志搞了一张肖家壁的像片，我军翻印了许多，分发到每个战斗小组。

9月21日，我军得到消息，肖匪只带2个亲信，出没在仙人迹、樟木坑、丁背坑、梨壁山一带。行动诡密，一晚转移多次。我军立即派出5个小队，包围了上述各点，但是连续5昼夜，合围17次，都扑了空。

9月27日，湖坑的一位老表跑来报告，肖家壁在湖坑。湖坑位于遂川、宁冈两县交界处的黄坳村附近。我425团立即组织部队向湖坑合击。

28日拂晓，2连9班搜索到湖坑西山时，战士赵文珍突然发现一个黑东西，从树丛里向山下滚了下去。这位机智灵活的战士带领一个战斗小组，也跟着滚了下去。从3尺多深的草丛中，一把抓住一个匪徒，战士们正掏出肖家壁的像片来辨认，一位老表赶上来说：

“不用对，他就是肖家壁，他就是‘肖屠夫’！”

活捉匪首肖家壁后，部队并没松懈斗志，仍然日以继夜地在深山里搜剿，在群贼无首的情况下，我军以军事进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广泛地发动群众，宣传我军胜利的消息和剿匪政策。

在9、10两月的进剿中，我军又先后活捉了王子华、王诚基、李在杰、

何樵夫等匪首。争取了沈志中、郭殿英、黄志中等匪首来投降。

11月份，我军进入了全面清剿与驻剿阶段，致使流窜在山里的散匪和上山为匪的地主无立足之地。就连肖家壁的亲信匪中队长黄永、林藻、黄传如、钟书保、高友仁等，也觉得在山上为匪毫无出路，即使逃往外地，也难逃人民的法网，因此，都自动归来，下山自首。

到12月底统计，井冈山地区只剩下零散潜匪80余人，成股土匪悉数被歼，全区匪势基本平息。

1949年11月21日，我军在遂川东河滩广场上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处决恶霸地主匪首肖家壁。吉安全区各县都有人来参加，广场上人山人海。

当把匪首肖家壁押上审判台时，会场上群情激愤，那些苦大仇深的群众代表上台控诉肖匪罪行时，个个是句句血，声声泪，泣不成声，他们趁指着肖匪，控诉其罪行时，猛揪他的耳朵和扯掉他的胡子。

当法庭列举肖家壁的罪状，宣布判处他死刑，立即枪决时，会场上掌声雷动，群众一遍又一遍地高呼：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神兵天降下翠微

在赣西南作战中，我48军432团从追歼截击残敌转为清剿土匪。

被匪首黄镇中称之为“上帝设计的天然险地”翠微峰，位于江西宁都城西北10华里，主要由12个山峰组成，原统称为金精山。面积约10平方公里。主峰屹立在金精山腹地东侧，正面远眺，直插云霄，峰顶被植物覆盖，像一只美丽的翠鸟，故而得名，它南北长，东西短，犹如一堵宽厚而陡峭的石壁，成为金精洞的天然屏障。

在翠微峰西北面山谷中的金精洞，地貌像个葫芦瓢，镶嵌在凌霄、石鼓、伏虎、技发、仙桃诸峰之间，洞口顶端为高达数十丈的峭壁，在峭壁上有人工凿成的仅能容一只脚的石梯通向山巅，就是有名的金线吊葫芦。南面的安仁山、观音山，西面的三献峰，北面的母狮峰、雄狮峰成品字形，将金精洞环抱当中，与翠微峰相对峙。

此外，还有莲花峰、瑞玉峰、香炉峰等，各山峰之间互不相连，但崖角交错。狭谷曲折幽深，有些深谷仰观只见一线蓝天。其东南出入通道“一线天”，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隘口。在翠微峰的外围，簇拥着许多连绵起伏，高低不等的山岗，成为护卫腹地地区自然形成的一个个“桥头堡”。

匪首黄镇中，又名黄才梯，此年52岁，宁都县长胜村人，原是无赖流氓，1929年混入红军，曾任连队指导员。1931年投敌叛变，先后任国民党挺进队长、团长、旅长，宁都县长，江西省第8专员公署专员兼豫章山区绥靖司令官，被授予中将军衔。这个叛变革命的败类，在他投靠国民党的19年中，为虎作伥，在赣南各县，先后残杀我党和政府人员、红军家属和人民群众9万余人，烧毁民房数万间，经他所践踏之处，被弄得阴霾四野，民穷财尽。老苏区人民称他是国民党赣南地区的一只“黄老虎”。

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江西省当局策划所谓“就地坚持”，看中了黄镇中这个恶势力的代表，指令他坚守豫章山区。

黄镇中经过冥思苦想，征集各县石匠200余人和大批民工，用半年多的时间修凿山道，建营房筑工事，于各山谷两侧山脚、山腰处，凿了40多个明

碉堡与无数个掩体，在各条谷口筑起连接山脚的石头寨墙，寨墙外修筑许多地堡，寨墙前边设置铁丝网和拉火地雷等障碍物，构成了立体的并有纵深的坚固防御阵地。

同时，黄镇中在其权力所及的第8行政区，横征暴敛，不到3个月就掠夺银元648万余元，稻谷2万担，以及大批油料、棉花、布匹、医药等物资，屯积于山中。妄图固守翠微峰，作最后地垂死挣扎。并疯狂地叫嚷：“有翠微峰，就有江西省”，“固守三四年，等待时机”。

黄镇中可谓机关用尽。

我432团5连于8月30日、31日两次夜袭黄匪外围突出部莲子山，俘敌39人。9月2日再次袭击莲塘坳，毙敌30余人，俘敌50余人，兴国保安团基本被歼。

我军从俘虏中，进一步察明了敌人的兵力及其配置情况：

跟黄镇中上山的共有2300余人，其中有战斗力的部队1800余人，其司令部设置在金精洞。

为了加强剿匪力量，9月3日，我428团副团长奉命率领该团第3营自寻乌赶来，配合432团作战。

9月10日上午9时，我432团9连夺取赤脚寨，俘敌18名。

当天夜间，我432团第3营向太阳山守敌发起进攻，毙敌5名，俘敌200余名。

9月16日夜，我432团3营9连夺取妙美坑，俘敌18名。19日下午4时，428团7连在少数火炮的掩护下，激战1小时，攻占朝阳山，又歼敌42名。

我军夺取敌外围阵地的行动，犹如把黄镇中防御体系剥掉了一层皮，黄匪所部被我军压缩在金精洞周围几个山峰上，其核心阵地暴露在我军火力控制之下，有利于我军进一步察明敌情和部署总攻。

为了全歼黄镇中股匪，不使漏网，防其突围逃跑变成散匪，我军在扫清外围作战中，有意隐藏意图，给黄镇中造成错觉。攻占太阳山时，使用了炮兵，他以为我军主攻方向在东南一线；但总攻前配属和支援我432团作战的军、师炮兵营的野炮、山炮和重迫击炮都不准开火，连试射也没有进行。只有营连建制内的82迫击炮和60迫击炮支援步兵战斗和打宣传弹。

这样，就造成了黄镇中的错觉，使他认为我军的炮兵不能上山，对他的坚固工事无可奈何。另外他以为我军善于夜战，不会白天发起攻击。

因此，我军便有计划地组织各分队在夜间积极佯攻袭扰敌人，白天则组织指战员反复勘察地形，选择突破口，确定突击目标和运动道路，开展军事民主，讨论战法；炮兵则明确压制和消灭的目标，测量距离与隐藏地构筑阵地。

总攻方案是在广泛深入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决定以集中对集中的军事进攻为主，紧密结合政治攻势。根据翠微峰的地形和敌人的部署特点，决定编成5个突击队，以头尖肚大尾巴长有持续力的战斗队形，沿着5条山谷突破并发展进攻。以5把刀子同时插入割裂敌人。强调既要互相协同，又要独立孤胆作战。控制山谷，夺取制高点，关门打狗，置黄镇中于死地。

23日6时30分，随着4发红色信号弹划破天空，数十门火炮突然开火，炮弹雨点似的向突破地段与山谷倾泻下去，刹时间，炮声在山谷内响彻云霄，硝烟迷漫，烈火熊熊。这些土匪杂牌军从来未见过这种场面。半个小时火力

准备，敌人的一些工事被摧毁了，有些匪徒被炸得血肉横飞，一个个哭爹喊娘。

当我炮火刚一延伸，各路突击队便像离弦的箭一般勇猛地冲向敌人阵地。

7点30分，428团第9连突破了一线天，接着占领了仙桃峰，随后向翠微峰方向发展进攻。432团第5连突破大石寨、小石寨之间北沟寨墙，向安仁山、观音山方向发展进攻。

第9连突破金精洞前一寨门，受到墙外一个地堡及两侧山脚火力夹击，因死角太大，炮火未能摧毁，曾3次爆破未获成功。这时，6班战斗组长贺春江，抱着“非把地堡炸掉不可”的决心，把党费交给党小组长，瞧了一眼身旁的战友刘荣，俩人突然穿过密集的敌火，向地堡扑去。

机智勇敢的刘荣利用死角纵身靠上地堡，将身贴在两个枪眼之间，随手向枪眼里投进一颗手榴弹，但爆炸后一瞬间，敌人机枪又叫了，他第2次将手榴弹投进地堡，却被狡猾的敌人扔了出来，他再次投弹时，右臂被敌侧射火力打伤。

这时，贺春江也负了伤，但见他愤然跃起，向敌堡入口处冲去，不幸中敌暗枪光荣牺牲。

刘荣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奋不顾身地爬到贺春江身旁取过他的手榴弹，用牙咬开盖子拉了火，翻身跃上地堡，只听一声巨响，手榴弹在敌地堡内开花了！

随着爆炸声，突击队乘势冲入突破口。9点15分，攻占了母狮峰，歼敌1个营约300余人，尔后进至红土标一线，控制了金精洞外围。

10点15分，攻占雄狮峰，歼灭敌团指挥所及1个营约300余人，尔后继续向三献峰发展。

这时，天空阴云密布，瓢泼大雨倾泻而下，翠微峰守敌居高临下踞险顽抗，以机枪和三献峰守敌机关炮配合，拼命封锁通向金精洞的道路。

我432团指挥所由剪子石转移到雄狮峰，令炮兵跟上来进行抵近射击，师炮营2连，扛着炮身、炮架和座板，沿着山崖陡梯，冒着暴风骤雨，艰难地向山顶爬着，一个摔倒了另一个接着扛起。正在发疟疾的炮手王远山，上山后累得口吐鲜血，但却打趣的说：

“我们的曲射炮如今变成直射炮啦，就让土匪们尝尝我们从北方扛来的炮弹吧！”

我军的大炮发言后，第6连乘我炮火威力，突然勇猛地扑向三献峰。5班长王玉波率战士用绳梯从侧翼先爬上三断寨，夺取了正向我4、9连射击的敌2门机关炮，被吓懵了的匪徒说：“莫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兵！”

11时许，6连攻占了黄匪称之为“西面围屏”的三献峰。这时，翠微峰、观音山守敌用机枪封锁6连冲向金精洞的道路，5班2名战士牺牲了。班长王玉波性急智生，遂令俘虏来的2名机关炮手调转炮口，向观音山、翠微峰射击。刹时，一连串的炮弹向翠微峰、观音山飞去。指导员带着5班率先跳下山崖，顺着山脊向金精洞扑去。

没过多久，5连在炮火掩护下歼灭了观音山守敌。翠微峰守敌见三献峰、观音山相继失守，便向我428团8连投降了。

我军的红旗插上翠微峰一峰又一峰，盘踞在金精洞的匪首黄镇中形同瓮中之鳖，就是插上翅膀也难逃跑了。加之我炮火延伸时，击中了他的粮油库，

火光冲天，指挥中枢一片混乱，更使他吓破了胆，忙派其副司令李馥斋到金精洞南寨墙上督战。

13时30分，担任预备队的我432团第1营，眼见这次攻坚战快没有自己的任务了，副营长便率1连加入了战斗，协同428团第7连攻占了马瑙寨、黄竹寨，正好居高临下，以火力控制金精洞和金线吊葫芦。

我432团6连从三献峰冲下来，进入通往金精洞南口山谷，这是一条丛林茂密、竹藤荆棘满布的阴森森的狭长深沟，6连的英雄们劈荆斩棘向前运动，5班战斗组长陆继成率领几名战士走在前面，一拐山脚就进入金精洞前山谷中，两旁峭壁高耸，抬头仅见一线蓝天。他们摸到洞口南寨墙，一排手榴弹扔了过去，密集地火力又射向敌人阵地，匪徒们未来得及抵抗，副司令官李馥斋就让他们举起白旗向我军投降了。

6连立即控制了金精洞，团指挥所随6连转移到南寨墙边。团首长刘桐山得知黄镇中在其油粮仓库起火时，带着一伙头目、妻妾老小及警卫人员，爬上了金线吊葫芦。

刘桐山遂命令李馥斋写信给黄镇中劝降，否则就将火箭炮调上来，向金线吊葫芦轰击，把他们都烧死在里边！李馥斋吓得发抖，忙请求：

“别这样！别这样！我马上写信叫他们投降。”

于是，李馥斋立即写了一封信，派一个放下武器的匪班长送上去，这个匪班长带着信件从金精洞口向顶上爬去。

据我军所知，黄镇中因作恶多端，害怕别人暗算，身边有一支40多名亡命之徒组成的警卫队。这些人几经挑选，训练有素，每个人有三件武器（驳壳枪、卡宾枪、冲锋枪），个个会武术。为防止意外，刘桐山即令6连占领有利地形，作好战斗准备，严密监视敌人行踪。

15时15分，匪首黄镇中第一个从岸壁凿成的石梯上爬下来，走到金精洞前的木台上（他原来的指挥位置），举起双手向我军投降。随后是第7专员公署专员兼豫章山区绥靖副司令官少将汤宗威，少将副司令官吴楚山，少将参谋长刘纪文、少将副参谋长何平、宁都县长兼豫章山区银行经理曹桂秋、兴国县长许烈、南康县代县长梅润林、宁都县副县长陈宏，还有个黑僧福元和尚，一个个学着黄镇中的样子，对我军俯首听命。

这时，李馥斋在刘桐山身旁说：

“主要成员都下来了。”

刘桐山当即宣布：

“你们的出路是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然后，即将黄镇中一伙押送师指挥所。

随后，已是乌合之众的黄匪指挥所的其他人员和警卫人员都陆续下来，放下了武器。原预计2至3天的攻坚战，9个半小时就宣告结束了。

进剿黄镇中匪部，自8月29日包围，至9月23日全歼，历时25天。计毙敌官兵350余名，生俘黄镇中及其所属全部官兵1965名。缴获各种炮14门、轻重机枪23挺、步机枪1165支、短枪250支、手榴弹2000余枚、弹药8.8万发及大批军用物资。还有黄金650斤、白银3775斤、散银元1012枚、大烟土610斤、粮食油盐200万斤，以及布匹药品等大批民用物资。

攻占集美传佳话

1949年9月，我29军向厦门以北的沃头、刘五店、集美地区攻击前进。19日我军攻占刘五店，20日拂晓拿下沃头，21日凌晨2时，85师对集美镇发起攻击。

集美镇，位于集美半岛的最南端，同厦门岛隔海相望。这里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故乡，他在镇里投资兴建了巍峨壮观的集美学村。驻守集美的国民党军队1个团妄图凭借他们修筑的坚固的碉堡群，和集美半岛北部的美人山、天马山，以及镇内的学校建筑群，构成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负隅顽抗。

我85师253团2、3营于21日上午分别攻占了潘涂、美人山、天马和英棣头，控制了集美镇北部。1营于22日拂晓占领了孙厝，进入集美镇南部的狭窄地带。因地形不利，1连在追击中遭到敌人杀伤，同敌人形成对峙。

下午5时，253团组织炮火向敌人轰击，掩护1、2连从西面，3连从东面向敌阵地突击。1、2连攻击顺利，3连遭到敌人顽抗，连续攻击均未奏效，连的干部先后壮烈牺牲。到23日拂晓，由2营4连接替3连，将敌人击退。253团遂进至集美镇外。

早在85师向厦门进军途中，就接到上级转来的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说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家乡集美办有集美学校，多年来广育人才，驰名中外，要我军尽力妥善保护，严防破坏。

85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把此作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及时向部队作了传达布置，提出了明确要求。当253团在集美镇外作战时，敌人一个炮兵阵地就设在集美学校附近，连续向我军射击。为了防止损坏集美学校，我军没有组织炮火对其还击。253团政治处主任张茂勋和1营营长沙杰，带领重机枪排突击敌人，敌人一颗炮弹打来，重机枪排排长牺牲，沙杰也负了伤。

23日上午，3营正面攻击集美镇，2营向集美码头迂回。到下午3时，集美镇为253团完全占领，集美学校完好无损。完成了周恩来副主席交给的任务。

23日傍晚，张茂勋找到集美学校负责人，告诉他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以及陈嘉庚先生正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情况。当天夜里，我军还组织干部战士帮助学校转移重要设备，疏散教职员工及其眷属，预防敌机轰炸和敌炮袭击。

不久，85师司令部、政治部还以师领导的名义，贴出了保护集美学校的布告。

布告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十五师
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查集美学校为华侨民主人士陈嘉庚先生所创办规模较大之学校，希教各部人员应尽量不必进驻学校，并坚决予以保护，严禁搬移或损坏该校一切教育用具及房屋、树木，仰各切实遵照为要！

此布

师长朱云谦
副政委晏成山
主任朱群

一九四九年十月

经过将近50个寒暑，这张布告一直由集美学校珍重地保存着，如今完好

如初地陈列在集美陈嘉庚先生纪念堂中，供后人参观。这件事充分说明，我人民军队对人民的贡献，广大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集美解放后，85师指挥所、观测所即设在镇内制高点上，对厦门岛北部的景物，可以看得清清楚楚。85师全师上下，立即投入解放厦门的战前准备工作之中。

为了让毛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9月，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同志，接受了周恩来总理交给的任务，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具体指导下，负责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布置工作。

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时间紧、任务重、难题多，最困难是如何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举行庆典时，毛主席在城楼上，五星红旗的旗杆则在广场上，总不能让毛主席从城楼上下来，到广场升旗，然后再走上城楼吧？为此，张部长召集同志们在广场新立的旗杆旁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把电钮安装在城楼上，毛主席一按电钮，五星红旗就徐徐上升，这个新颖的设想获得大家一致称赞。于是，这个任务就交给了电讯机械修配厂的苏冶同志具体负责。

大概是9月27日深夜，电钮装置试制出来了，大家就用一面同五星红旗大小相仿的旗子进行试验。当按动电钮后，旗子果然徐徐上升了，大家高兴极了。但没想到，旗子升到了旗杆顶端，却不听“招呼”，还继续往上升，然后就被卷进顶端的滑轮里了。糟了，拉不下来。只好调来消防车，想竖起云梯去摆弄。嗨，云梯离杆顶还差一大截，够不上。怎么办？还是一位工友自告奋勇，爬上旗杆顶端才将旗子取下来。要是开国大典那天在升旗时出了事儿，那可就成了重大政治事故了。好急煞人哪！于是，大家继续研究、试验，这样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最后，在电钮上安上个限时装置进行再试验。第二天深夜，经过反复升降，证明万无一失，大家的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9月29日夜，整个典礼程序进行总预演，经周总理等领导同志审查验收，终于合格了。

10月1日，万众欢腾。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在雄伟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按动电钮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古老而又崭新的东方大地上冉冉升起的时候，张致祥他们比别人更激动，更兴奋！两眼不禁闪出幸福的泪花……

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9月初，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主组成200人的军乐队，参加开国庆典活动，罗浪和王建中同志分别担任领队和正副指挥。

10月1日下午两点钟，他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徒步进入天安门广场指定位置，等待那庄严的时刻到来。2点50分，当毛主席、朱总司令等新选出的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罗浪和王建中便指挥乐队奏起了《东方红》。中国有句古语“无三不成礼”，《东方红》乐曲一连演奏了三遍，这时，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也刚好站立在天安门城楼正中央。3时整，开国大典开始，在这庄严的时刻，军乐队第一次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

《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乐曲声似滚滚春雷，响彻云霄。在国歌声中，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国歌连续演奏了三遍时，刚好 54 门礼炮响过，国旗也正好飘扬在旗杆顶端。

接着，朱总司令在聂荣臻同志的陪同下，来到陆海空三军方队前时，乐队奏起《解放军进行曲》。检阅开始后，乐队又连续演奏了《抗大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乐曲。

分列式开始后，乐队又伴随着通过天安门观礼台前的各个方队，奏起具有方队特色的乐曲。分列式结束，紧接着数万名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前，乐队接着演奏《团结就是力量》、《保卫胜利果实，胜利挺进》等乐曲。

这一天，军乐队连续吹奏了三四个小时，不少同志的嘴都吹肿了，汗流满面，但谁也不感到累，因为大家心中明白，这是在为新中国高奏团结胜利的乐章。

1949 年 9 月底，魏来国从华东到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作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被选入政协主席团。当听说主席团成员要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时，他的心情无比激动。这个贫苦家庭出身的人，能登上天安门城楼，那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那年，他 24 岁，当营长。

10 月 1 日中午，他们在六国饭店（现在的北京饭店）与陈毅、许世友等元勋们在一起共进午餐。大约下午 2 点 50 分左右，当他们来到天安门城楼西侧时，毛主席也到了，只见主席穿一套黄色呢制服，下车后就顺城台阶上去了，其他领导人顺序跟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前排以毛主席为中心左右排列，而后排的人是随便站。魏来国站在后排，恰好在主席身后。下午 3 时整，庄严的时刻来到了！当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典开始时，毛主席站在麦克风前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声音响彻四方。顿时，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欢声雷动，彩旗翻卷。此时此刻，望着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俯视着广场上那人的海洋，魏来国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模糊了双眼。

当毛主席亲手开动电钮，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迎着震天的礼炮，整个广场沸腾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把庆典活动推向了高潮。此时此刻，毛主席也十分激动，对着麦克风不断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1949 年过了“八一”以后，马骥受领了组成炮兵分队参加开国大典的受阅任务。

参加阅兵的炮兵方队，要求同步兵一样严格，行进中为保持车队前后、左右形成一条线，每个司机用一块厚度一样的木块垫在踏油板下控制油量，解决踩油门时用力不一样的问题，车速就一致了。上级还规定，开国大典那天，每台车要保证不中途“抛锚”。马骥心里也清楚，完成好这次受阅任务事关重大。因此，大家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好任务，让毛主席满意，让党中央放心。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0 月 1 日凌晨 4 时，炮兵分队就提前赶到了东单

一带集结待命。在炮兵分队前面的是步兵分队。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下午 3 时整，广播里传来了毛主席那宏亮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大家心情无比激动，个个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时，马骥不由得想起了刚参军时学会的那首歌：“往西走，过黄河，就到西北陕甘宁，那里住着共产党，那里住着毛泽东……”

分列式开始了。炮兵分队行进在步兵方队后边，巨龙般的车队，牵引着 57 反坦克炮、75 高射炮和 150 榴弹炮，“轰隆隆”地通过了天安门观礼台前。当马骥第一次看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时，心里感到无比幸福，多么想在天安门前多停留一会儿，多看上几眼啊！

1949 年秋的一天，某军通信营接到上级命令，立即赴京作为步兵分队参加开国大典受阅活动。

从受领任务到接受检阅，时间只有一个月，大家既激动又焦急。指导员看出了大家的心思，动员说：“我们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几十年来，有什么困难难住过我们？这次任务虽然时间短，但只要我们心里装着祖国，任务就一定能完成！”听了指导员的动员，大家的训练劲头特别高。

队列训练是很苦的，但干部战士都很自觉。那时因为部队长期行军打仗，谁也没有正儿八经地搞过队列训练。可同志们有的是办法，为保持摆臂时两手间的标准距离，就用背包带拴住手腕，挂在脖颈上。有的同志为尽快达到要求，好多天把背包带一直系在脖子上，脖劲磨出了血，也不叫一声苦和累。

10 月 1 日那天凌晨 2 点，他们早早吃过饭，就步行到南池子待命。直到下午 3 点整，当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大家兴奋得简直无法形容！多少年了，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尽管指导员多次提醒大家“冷静”，但在这庄严的时刻，谁能不激动不欢呼跳跃！想起了渡江战斗中那隆隆的炮声；想起了烈士们临终前的嘱咐……泪水模糊了眼睛。

紧接着，朱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乘车检阅了受阅的陆海空三军。参阅方队的指战员们精神抖擞地迈着雄赳赳的步伐，走过了天安门广场。

阅兵式结束了，指战员们激动的泪水还是一个劲儿地往下淌……

1949 年六七月间，王志国在华北军区某团炮二连当副指导员。一天，上级通知选拔体育代表队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活动，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极了，便自告奋勇报名参加了选拔赛，在师、团两级运动会上，取得了 800 米和 400 米赛跑第一名。就这样，他被选中，并当上田径集训队队长，负责全队训练。

9 月初，田径队和棒球队、篮球队一行几十人从张北的怀安县出发，然后坐火车前往北京，参加全军文艺体育表演。

临近 10 月 1 日的那天晚上，领导通知王志国代表华北军区参加 400 米径赛。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激动，他一宿都没有睡着，半夜还偷偷爬起来跑了两圈。第二天上午 9 时，先农坛体育馆红旗招展，彩球飞舞，看台上座无虚席，体育表演队步入会场后，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那雄壮激越的旋律，使他想到千千万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想到新中国光辉灿烂的明天，禁不住热泪往外流。这是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天。

体育表演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进行。轮到王志国走上起跑线时，这个战火中成长的年轻人心情激动得无法形容。发令枪一响，他一鼓作气跑到了终

点，当队友们一起越过主席台时，不知谁喊了一声：“看！周恩来、贺龙、聂荣臻……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出席了那天的盛会。

新中国开国之夜的“礼花”

1949年秋天，中央决定在全国政协会议后举行开国典礼和阅兵游行。阅兵指挥所副主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给作战科长张桂文交待了任务：“根据开国典礼方案的程序，群众游行后在天安门周围燃放礼花具体办法，参照苏联十月革命节阅兵式。”

阅兵指挥所在大华电影院组织观看了苏联阅兵式的纪录片，其中就有燃放“礼花”的场面，其实，那不是礼花，是五颜六色的信号弹。由于当时物资匮乏，只能以此代用。不久，苏联给我们运来了半火车皮的“信号弹”，权作“礼花”。

张桂文带上作训处几位参谋，在北京选定了6处燃放点，以天安门为中心，北面设在景山山顶和北海白塔下面，中间设在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的开阔地上，南面设在邮政管理局大楼（东交民巷东口）的楼顶。同时组织担负卫戍任务的独立第208师两个建制连为燃放“礼花”部队，在辅仁大学的体育广场上进行严格的编组训练。9月28、29日的夜晚，信号兵们分别在北海、景山两个发射点进行试放。

10月1日下午3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阅兵式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前。在苍茫的暮色中，欢腾的群众燃亮了灯笼火把，广场成为灯火的海洋。

张桂文立于东华表内侧的指挥台上。当群众游行队伍快要过完天安门的时候，电话里传来了天安门上指挥部首长的命令：“燃放礼花！”张桂文立即凑到麦克风前，向部队发口令。不料，扩音喇叭出了故障，一点声音也没有，事不宜迟，按着预定的应急方案，马上抽出携带的信号枪举过头顶。“砰”的一声，一颗碧绿的信号弹，带着长长的耀眼的光芒，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瞬间，广场周围的6个发射点几乎同时轰然爆响。一簇簇五彩夺目的信号弹骤然升空，叠织出奇光异色的绚丽图案，把大典之夜点缀得壮丽辉煌。随着“礼花”的每一次起落，欢呼声犹如大海潮涌，一阵阵漫卷过新生的古城。

一个吻的传奇故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使众心激扬、万民沸腾。当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挥动巨手升起五星红旗时，一个小小的插曲发生了，有个曾被八路军从日寇刺刀下救出来的长辫子姑娘情不自禁地越过警戒线，扑向阅兵的行列热吻了一个陌生军官。这个情景被记者不失时机地抓到了，很快这张照片见报了。看着这张照片，那位阅兵时被吻的年轻军官——解放军驻京某部团长冯建刚的心灵震颤了：这是共和国人民对军人的最高奖励！冯团长当时风华正茂，伟岸英俊，也未曾婚配。他很想与这位陌生的姑娘交个朋友，遗憾的是，照片只摄下了长辫子姑娘搂着军人脖子的背影。

当记者在新闻媒体上透露了英雄团长的内心秘密后，许多姑娘都想圆这

个美丽的梦。姑娘们雪片似的求爱信飞到了部队。一些人还不断地找上门来，指着报纸上长辫子的背影说：“这就是我！”然而，每当冯团长问及受吻时他说过什么话时，来访的姑娘没有一个能答对。

两个月后的一个风雪天，有辆黑色的轿车来到了部队。中年司机领着一位俏丽的小姐，走进冯建刚团长的办公室介绍说：“这是我们东亚公司总经理的三小姐胡曼丽。九月下旬，她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继承父业，有缘在开国大典那天吻了您。”

中年司机介绍之后，冯团长注意看了一下“三小姐”的长相，嗨！冯团长哪儿见过如此艳丽的佳人呢？冯团长似乎心动了，不过当中年司机要拉冯团长会见未来的岳父母时，他没有忘记问：“尊贵的曼丽小姐，你吻我时，记得我说过什么吗？”

曼丽小姐先是一怔，尔后稍一镇静回答：“您说过‘我爱你’。当时还羞得我怪不好意思呢。”冯团长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推诿说部队工作忙，抱歉没有时间赴约。

就在曼丽小姐和中年司机仍不肯罢休时，还是那位曾给英雄团长抓拍过照片的热心记者，领进来一个相貌端正、长辫子农村姑娘说：“冯团长，她叫李萍儿，是京郊村庄的妇联主任。她刚才找到了报社对我说，‘转告英雄团长甭费心思找了，照片中吻他的那个姑娘就是我。’还说她这个村姑配不上英雄团长，是我硬拉她与你见面的！”

冯建刚团长多次上当，对此事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了。不过他还是客客气气地问村姑：“吻我时，我对你说过什么吗？”姑娘看出了冯团长的冷淡，更感到受了羞辱，她轻轻地说：“你当时什么都没说。”说罢，满眼含泪跑出了冯团长的办公室。冯团长激动了，大喊一声：“就是她！”跳起来追出门去……

这件事自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不久之后，冯建刚团长和李萍儿喜结良缘。

刘邓挥兵进西南

我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解放上海之后，毛泽东深谋远虑，及时抓着有利时机，调整部署，将1948年12月确定的在渡江战役之后由2野、3野经营东南，改为2野在恰当时机进军西南，于1949年5月23日提出：“2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

7月16日，毛泽东针对敌人力避决战的新特点，提出了对中南、西南诸敌实行远距离迂回围歼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他指示2野：

“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刘伯承、邓小平深感毛泽东韬略高明，谋虑深远，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于8月19日拟定了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该命令指出：“本野战军主力（除4兵团）之任务，在于攻击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州、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

这个命令创造性地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歼敌方针加以具体化，对大迂回的战略意图、进军方向、兵力部署、具体要求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命令要求2野主力以大迂回的动作，从黔北进入川东南，切断包括宋希濂、孙震两部在内的川中所有敌军南逃贵州、云南之路，以利我军包围聚歼。然后再与1野第18兵团协同作战，歼灭胡宗南部，解决全川问题。命令具体要求：

5兵团于9月初由（江西）上饶弋等地出发经南昌、长沙，10月10日以前到达（湖南）武冈、邵阳、湘潭之线，11月20日以前攻占（贵州）贵阳、黔西，尔后第17军留置贵阳，兵团主力应于12月10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四川）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协同3兵团作战；

3兵团10月10日以前到达（湖南）常德、江陵之线，11月20日以前攻占（贵州）遵义、彭水、黔江，尔后以一个军控制咸丰、黔江、彭水，监视与牵制（四川）涪陵至万县等地之敌，待机作战，兵团主力于12月10日以前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敌，协同5兵团作战。

刘、邓首长要求两兵团协同作战，完成渡江攻占宜宾至江津地带后，顺势攻占富顺至璧山之线。这是战役谋划的大手笔，是一个双层大迂回包围歼敌的计划。第一层大迂回包围由3兵团实施，第二层更大范围的迂回包围由5兵团完成。一旦这个双层大迂回包围的计划实现，川东和重庆之敌南逃云南之路将被彻底截断，我军瓮中捉鳖，四川境内之敌被全歼的命运也就完全注定了。

“8·19命令”很好地体现和补充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南力求全歼敌人于国境之内的战略思想。因此中央军委于8月20日迅速回电，对刘伯承邓小平拟定的“8·19命令”表示完全同意。9月12日，毛泽东致电2野和4野领导人再次指示说：“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至此，大迂回大包围歼敌方针完全形成。

战略部署定下，战役实施仍需施谋用计。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运用了一系列“兵不厌诈”、“声东击西”的谋略，有计划地给敌造成了错觉，领导2野部队实施了一系列的调动和佯动。

9月中旬，2野第5兵团和第3兵团第10军从浙赣线出发经赣西和湖南的湘潭、邵阳地区，隐蔽秘密地向湘西黔东集结。此时，4野第12兵团正在经湘潭、湘乡向南进军，第13兵团经湘西向南进军，起了掩护2野主力西进的作用。2野第3兵团则公开由浙赣线出发经南京北上，到达南京时，南京人民举行了热烈欢送2野北上的活动。

接着，一列列满载兵员和武器的火车从浦口往北开，在徐州转陇海路西进郑州。刘伯承在郑州人民欢迎2野的大会上公开发表讲话，表示了经陕西南下四川的决心。新华社对此还发表了消息。这样既起了掩护2野第5兵团向贵州进军的作用，也给敌人造成了2野主力将首先从陕南入川的错觉。

然而，在实施了上述一系列佯动之后，2野第3兵团却由郑州秘密南下，经信阳、孝感等地向鄂西秘密挺进。

在通过调动兵力故意示形于敌，造成敌人错觉地同时，毛泽东及刘伯承等人还通过领导人的活动行欺敌之策。九、十月间，当2野全军正秘密向鄂西、湘西、黔东地区集结时，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却出现在了北京。8月，

毛泽东安排邓小平在全国政协筹备会议上作报告。10月1日，刘、邓在北京同时出席开国大典。在此期间，毛泽东与刘、邓、贺一起当面会商了我军进军西南问题。其后，直到10月20日，刘、邓才离京赴湘，就近指挥已达常德、湘潭一线的2野部队向四川进军。

刘、邓北上之日，正是2野主力通过华中地区，隐蔽地向湘西、黔东开进集结之时，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2野部队完全以4野部队的名义出现，其作战事宜也统由4野首长指挥，这既有利于两大野战军的协同配合，也有利于隐蔽2野向西南进军的战略进军方向，以收出奇制胜之效。

此外，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具体部署，在6至8月间，陕南军区、湖北军区、4野第13兵团等部队分别在川陕边、川鄂边实施了军事佯动，也给敌造成了错觉，以为人民解放军将从陕南、鄂西先行入川，从而有力地配合了2野的军事行动。

上述一系列活动，使敌人产生了错觉，错误地把防御重点放在川陕、川鄂边，对川湘边则疏于防范。这样，我大军便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在川湘边、湘黔边，并进军贵州。在蒋介石惊叹贵阳危急，重庆难保之际，11月13日，陈立夫和70余名立法委员发电报至台北，催促蒋介石赶赴渝坐阵，挽救危局。

11月14日，蒋介石怀着“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的心情，决心再作一次最后的挣扎，再次飞抵重庆，调胡宗南部增援重庆，做挽救重庆危局的最后努力。

毛泽东从歼灭胡宗南集团迅速扩占全川的战略目标出发，提出了吸引胡宗南部据守重庆加以歼灭，打一个像“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的想法。为此，他于11月27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商量这一设想是否可行。电报说：“根据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

刘伯承、邓小平接电后，马上进行了认真磋商，根据战场情况，于当日即回电，向毛泽东提出了不宜在重庆聚歼胡宗南部，不宜迟缓攻占重庆之行动，“仍以尽可能提前渡江，并视情况注意或夺取重庆为较稳当”的建议。

接着，刘、邓陈述了六条理由：“（一）蒋调第3军援重庆系建筑在罗广文能守住南岸綦江、南川地区，孙震能守住由涪陵迄万县江防的前提下，如果我在南岸能基本歼灭了罗广文，而孙震兵力又感单薄的情况下，蒋又可能改变其计划。（二）我12军及11军主力，明俭日（28日）可能占领綦江及其以北之龙岗场。敌第3军养日（22日）始由汉中南开车运亦难赶到，即使赶到，如没有后续亦无大作为。蒋胡之持久战，似亦不致加调兵团置于此绝地。（三）我西路3个军至迟亥月（12月）10号可达泸州、合江江边，如我迅速渡江并控制泸州、松山之线，则胡宗南退滇之一条公路线即被截断。因此，敌一经发现我进到叙水、赤水，即将考虑加强川西与康东之沿线。（四）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五）重庆地形险要，如较多兵固守，攻取费时。（六）在敌薄弱时，至少在一段早点争取渡过长江、跨江南北机动，较为有利。”

以上这封电报深刻地反映了刘伯承、邓小平善于独立思考，敢于为革命负责的精神以及虑事周详的非凡才能。他们尊敬毛泽东，但为了党的事业，

又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前战场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接到刘邓请示电后，毛泽东很快即于 11 月 28 日回电答复：“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毛泽东完全采纳了刘邓的建议。在同一复电中，他又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和应采取的相应对策供刘邓考虑：“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 11、12 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

毛泽东在 11 月 27 日的电报中连续两次使用“是否”二字，在 11 月 28 日的电报中则强调：“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从上述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尊重实际，发扬民主，善于集中集体智慧的作风。

经过上述一系列决策过程，全歼西南之敌的方略完全形成了。

一道风趣的命令

王震在解放战争中一直指挥着西北野战军第 1 兵团战斗在解放西北的战场上。胡宗南的主力部队被我军消灭以后，他又指挥 1 兵团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向顽抗的马匪——马步芳、马鸿逵部发起了凌厉的攻势，打得自称杀人不眨眼的马匪骑兵接连败退，直至占领了马匪在青海的老窝——豁镇的马家公馆。当晚，司令部作战科的同志们和王震就住在马家公馆的会客室。当王震安排好部队的宿营回房休息时，发现这间空空的屋子里作战科的同志们全都打地铺，仅有的一张木床上放着自己的行李。于是，他走过去卷起自己的行李铺在地上，一边说了句：“这是你们谁干的好事？”

同志们见他要睡地铺，赶紧阻拦，一边拖着把王震的铺盖往床上搬，一边说：“司令员还是睡床上吧，地上挺挤的，空着床干什么？”

王震一听，觉得有道理，他望着作战科的同志，立即点名让一位陈参谋把行李搬上床，陈参谋怎么肯自己睡床呢，非说自己在床上睡不着觉，坚持让司令员睡床。推来让去，王震一看用商量的办法不行，就唬起面孔，下了命令：“我‘王胡子’命令，让作战科陈参谋睡床，不得违抗！”

“太不应该了，司令员怎么能下这样的命令呀！”陈参谋小声嘟囔着，但命令还得服从，只好勉强把自己的行李搬到床上。

看着陈参谋受委屈的模样，王震忍不住露出了笑脸，赶紧解释：“我们进军大西北，你陈参谋最辛苦，身上背着武器和背包，还要扛上一大捆地图和测绘器材，当然应该优待你睡床嘛！”

大家听了这道风趣的命令也都笑了起来。

敌人团长学狗叫

1949 年 9 月，15 兵团司令员邓华命令：第 43 军在 4 兵团围攻曲江的同时，完成对始兴、新江圩敌 2 个师的奔袭合围，歼敌后向广州进军。各部队均于 9 月 30 日由南康出发，以急行军经梅岭关、始兴、翁源、花县向广州攻击前进。

我 43 军 127 师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进行向广东进军的一切准备，并于 9 月 30 日仍作为 43 军的前卫师，由南康出发跨越广东门户——梅岭关、南雄、始兴、翁源，长途跋涉在五岭山脉里。

部队在行进途中，不仅受到了赣粤边界老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传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特大喜讯！全师指战员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欢呼雀跃，口号震天，纷纷表示：

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勇敢地打到广州去，消灭一切敢于抵抗之敌，彻底埋葬蒋家王朝，以实际行动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10月9日，经过一昼夜的行军，部队路过翁源县时，突然看到迎面从前方赶回来的侦察连长李世印，带着骑兵班和地下党员，押着2名刚捉到的俘虏来向师长王东保报告：

“据侦察，前面佛冈县、花县有敌人据点，是敌第39军第103师的307团（号称钢铁团），全付美械装备，共约2000余人（包括地主武装百余人），已占领佛冈河（琶江支流之一）两岸山地，并构筑了较坚固的工事和地堡，准备死守”。

王东保根据以上情况立即决心：一面将情况及时报告军部，一面命令部队跑步向佛冈前进，尽量接近敌人，迅速查明情况，首先分割包围歼灭该敌，而后继续向广州进攻。

部队10月9日夜到10日下午4时，急行军70余公里，进到距县城10余里的龙水井地区。

佛冈县是去琶江口火车站、花县、从化、广州的必经之地，是广州外围的重要掩护据点之一，是敌我必争之地。因此，我127师必须歼灭该敌，夺取佛冈。师首长决心：各部队要利用夜暗，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迅速对敌实施分割包围，力求全歼当面之敌。

在我军强大的炮火支援下，经30分钟激战，步兵迅速突破了敌主阵地，然后向敌地堡发起冲锋，由于种种原因，第一次冲锋未能奏效。在2门山炮的抵近射击的火力支援下，又组织了第二次冲锋，很快攻克了敌人的核心地堡。顿时，敌人全线溃退，部队对残敌跟踪追击，一举攻克了佛冈县城和城南的佛冈村。我381团主力和379团部队，在我军炮火的支援下，攻克了敌两个高地的外围阵地。

当两个团正组织对两高地进攻时，我军野炮营赶上来了，在炮火的全力支援下，379团迅速突破了敌2营阵地。该团2连连长白云生率领的突击队，首先夺取了敌1号碉堡，7、8连两次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终于在当日17时，攻克了敌核心阵地。

敌团长王家侦，经过一番精心打扮，在胸前塞上两团棉花，化装成女人，想逃往广州，被我军379团1个侦察员发现，他便躲在草丛中学狗叫，企图混过去。但这并没能骗过我机智的侦察员，最后还是当了俘虏。我军全歼敌307团，佛冈战斗胜利结束！

击毙“云山王”

匪首熊扬鹰系国民党军统局特务分子，解放前历任永修县伪保安大队长，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常备大队中队长，“抗日”游击队长等职，盘踞云山一带达10年之久，长期压榨人民，实行血腥统治，群众称之为“云山王”。

解放前夕，熊匪在伪国防部军统局指使下，大肆搜罗伪保安队、乡保队，以及伪军官、职员、兵痞流氓、地霸分子等，成立伪“国防部青年救国军赣西北义勇纵队第22支队”，熊匪自任支队长，下辖4个大队，1大队长邹向

荣，2 大队长涂元志，副支队长兼 3 大队长曾彪，直属大队长马文宣，共约 300 余人，盘踞于靖（安）、永（修）、安（义）3 县间的云山地区，向群众强行派粮索款，抽征壮丁，并大肆造谣欺骗，胁迫群众不准与我军接近。

同时，熊匪所部还在整个 3 县地区建立了情报网，在外地设立了联络站，与波阳土匪李逢春，九江土匪罗淇淦等，均有密切联系，相互呼应。

1949 年 6 月间，我大军横渡长江后，陆续由武宁至南昌间公路上向前挺进，我 43 军并曾驻扎于武宁至永修间的公路沿线上，熊匪在我大军声威震撼之下，紧缩其力量于云山内地，一面以其一部向我假投降，企图迷惑我军，减轻对其压力，一面则强迫群众不准给我军带路，不准向人民政府缴粮纳税，并以小股匪徒，埋伏于交通要道、交叉路口等处，杀害我掉队人员，抢劫运输车辆等。

云山位于永、安、靖 3 县交界地区的三角地带，山高林密，地形险要，多石洞，道路狭小而多歧叉，食粮困难，村落稀少，居民不多。因交通阻塞，一般群众对外界情形非常隔膜，言语也较难懂。生活水准因受反动派长期统治，降至很低。当地群众因受土匪欺骗蒙蔽，对我军非常恐惧，故在我军初期进入云山地区时，每村仅有数名老弱残废守门，余均逃避一空，增加了剿匪的困难。

我以南昌分区 4 个连及九江分区 2 个连，共 6 个连的兵力，于 10 月 18 日，开始对云山围剿。进入云山后，首先进行政治攻势和耐心的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纷纷下山回家，逐渐与我军靠拢，打烂了匪之通讯网，使其失掉耳目，并逐渐建立了我军的情报关系。

接着，部队开始向匪进剿，实行远距离的奔袭合围，并派小部队侦察搜索，组织群众搜山，捣毁土匪的茅棚窠穴，使其无可藏身之地。至 11 月 11 日 23 天中，共战斗 4 次，盘踞云山之匪，除直属大队长马文宣带领残匪，漏网窜去武宁方向外，全部被我军歼灭。

匪首熊扬鹰在我军猛烈清剿之际，带领卫兵 2 名藏匿于山中的茅棚内，11 月 11 日我 468 团 4 连战斗小组长盛德率领战士 2 名搜山，发现熊匪正在茅棚内烤火，盛德冲入棚内，与熊匪搏斗，熊匪的卫兵一看势头不好，马上弃枪逃去，熊匪亦企图逃走，盛德不得不开枪射击，熊匪应声倒地。为害人民 10 数年之久的熊扬鹰，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这次剿匪，我军共击毙熊扬鹰等以下 10 名，俘匪副支队长陈克桃等以下 159 名，缴获轻机枪 3 挺，冲锋枪 3 支，短枪 10 支，步马枪 95 支，子弹 1300 余发。匪大队长曾彪、涂元志等 30 余人投降，交枪 21 支，轻机枪 1 挺，稻谷万余斤。

智取天险入贵州

1949 年 6 月，刘伯承、邓小平首长依据制定的川黔作战方案，命令 5 兵团和 3 兵团 10 军攻占贵阳及黔东南，以大迂回的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州、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及其以北地区，使国民党军宋希濂集团（辖第 14、20 兵团）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陈地区，尔后聚歼这些敌人或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

同时，刘、邓首长还具体命令 5 兵团和 3 兵团 10 军由湘西入黔，于 11 月 15 日前攻占贵阳，兵团主力 11 月 25 日攻占毕节，12 月 10 日攻占宜宾至

纳溪地区，完成战役迂回，配合3兵团主力在川东的作战，在进行战役迂回中解放贵州，挡住敌人的退路。

人民解放军10多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贵州，开始了解放贵州的战斗历程。

16军46师以138团为前卫，于4日渡过湘黔边的清水江，占领贵州的瓮洞、邦洞、天柱后，继续向西疾进。由于48师前进道路被敌严重破坏，未及时进到天柱。该军即令47师进占天柱，并紧紧跟进，以掩护46师侧后；48师则沿贵州的锦屏、剑河、台江方向前进，保障军左翼安全。

正当国民党第49军专注沿湘黔公路西进的解放军部队时，解放军46师已迅速前出到敌重点设防的湖南晃县、贵州玉屏的右侧。敌慌忙以1个团进至瓦寨，想阻止解放军前进。但解放军前卫主力已迅速绕到其侧后，该敌被迫仓皇由山路向西南逃窜。解放军歼其掩护分队后，即向贵州三穗疾进。

49军恐三穗被解放军占领后，其在三穗东北地区部队的后路被切断，忙向西撤退。敌第一线防御即行瓦解。我军部队乘机向三穗、镇远挺进。敌在三穗的后卫分队慑于被歼，连夜放火后向西逃窜。46师先头部队跑步穿过烟火迷漫的三穗城，紧紧地盯着敌人的屁股直追。逃敌企图炸毁镇远城边河上的大桥，阻止解放军西进。因解放军尖兵行动很快，敌人只慌忙地放两包炸药，将桥面炸了两个小洞，即仓惶鼠窜。解放军部队又冒雨追出30里。

我军先头部队，从4日中午进入贵州境内，只用3天半时间，即前进400里，于7日下午到达镇雄关。

镇雄关为黔东的门户，也是敌黔东防线第二线上的要点，是我16军和5兵团主力向贵阳进军必经的咽喉要道。其西侧的鹅翅膀，有两个海拔各800米左右的高山，坡陡势险，难以攀登，犹如天鹅飞起时展开的双翅，紧紧卡着湘黔公路的隘口。岸陡谷深的相见河，由北向南横向流经鹅翅膀的前面，像一条又宽又深的护城河一样，拱卫着这个险关要隘。

湘黔公路的这一段，从深谷徒壁上穿过，在前后不到2000米的距离上接连拐了16个急弯，经过3座在河谷上架起的险桥，还有一座敌人火力能直接控制的、由公路回转形成的螺蛳桥，再沿深谷陡坡盘旋上去，穿过隘口才能通往贵阳。鹅翅膀的南面，是湍急的舞阳河，北面是云遮雾绕的连绵高山，没有可供大部队通过的道路。

这一险关，是敌我必争之关口。

我军突破敌第一线防御后，敌49军即令249师745团，在鹅翅膀凭险固守。企图卡住这个天险隘路，必要时炸毁螺蛳桥，破坏隘口通路，阻我前进，以掩护其主力向西撤退。

16军能否迅速夺取鹅翅膀并保全通路，不仅仅关乎本军的进军速度，而且已成为我5兵团主力能否顺利地向贵阳进军，以至完成大迂回任务的一个关键问题。

16军的任务不轻。

尹先炳军长、王辉球政委不但善于斗勇，还十分善于用谋，他们考虑，若从正面强攻，不但会增大伤亡，而且在敌人难以支撑时，就会孤注一掷将这唯一的通路破坏，我军的车、炮和辎重分队将难以通过，会给执行大迂回任务带来困难。因此，他们决定出奇制胜，指示46师，采取奇袭手段，迅速攻占鹅翅膀，并确保通路不遭破坏。

46师138团根据军的指示，先是以3营从公路南面，绕经鹅翅膀。但在

途中被深谷陡壁所阻，无法前进，又只好返回。于是3营决定派5连智取鹅翅膀。

5连在暗夜中艰苦行军3个小时，找到了一条乱石小路和唯一的村寨梅子山。过了梅子山，虽有一条羊肠小路，行军仍然非常困难。

当5连最后逼近敌人阵地时，前面又出现了一座像墙一样陡峭的山岩，阻挡住了前进的去路。怎么办？改道吧，时间不允许，而且可能被敌人发觉，影响整个作战计划。

任富月连长当即立断，立即命几个体壮力大的战士搭起人梯，他带头爬过人梯，不顾一切地攀上岩去。然后，他解下自己的绑带，拴在一棵小树根部，把战士们一个一个地吊上去。这样，5连的勇士们很快冲到敌人的工事附近。

“干什么的？”敌人的哨兵厉声喝问。

紧接着，是几下“哗啦，哗啦”的拉枪机声，敌人的3个流动哨兵叫嚷开了。

“8连的，我们在镇雄关被共军打垮了。”

任连长从白天了解的情况中得知，这里的守敌是49军249师的1个营，便随机应变地冒充敌军答话。

这时，8班副班长阎书金上来了，马上手扣枪机撂倒1个，另1个家伙见势不好，把枪一甩抱着脑袋逃跑了。阎书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用枪口抵住了剩下的1个。

抓住1个活的，等于得到了一把开锁的钥匙。这个家伙很听话，问啥答啥，5连没费多大工夫，便把守敌的情况全部搞得清清楚楚。

接着，3排长赵振江带着8班，由刚捉到的敌哨兵引路，迅速插到鹅翅膀附近的刘家庄侧后方。

这里的敌人都还在蒙头呼呼大睡。当8班冲进敌人住的房子，把枪口对准了他们时，这伙敌人才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

就这样，没放一枪，敌人的1个迫击炮排就被解除了武装。5连还缴获了两门迫击炮。

接着，连长任富月带领1排冲上了鹅翅膀的主要山头。

这出其不意的袭击，犹如神兵天降。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会从没有人迹的侧后方趁黑夜冲上来，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更好笑的是，有的抱着枪靠着战壕睡觉，当解放军的冲锋枪对着他们的胸口时，还没清醒过来，糊糊涂涂地当了俘虏。只有几个狡猾的家伙溜得快，没命地滚下山逃跑了。

鹅翅膀终于被机智勇敢的5连指战员占领了。

一轮朝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红霞燃烧着天际，我军后续部队顺利从鹅翅膀下通过。看着潮水似的战友们从身边浩浩荡荡向西开去，站在鹅翅膀上的5连勇士们个人喜笑颜开，高兴地向战友们挥手致意。

攻下天险鹅翅膀后，敌黔东防线即被我军完全突破，我军向贵阳进军的道路也就彻底打开了。

1949年11月，我46师部队向贵阳进军中，加快了行军速度，每天都是行军百人以上。战士们数着公路旁的里程碑，计算着到贵阳的日程。

但是，由于连日行军，有些俘虏兵脚打起了泡。师政治部群联科长张梓就带着他们掉到了队伍后面，心里很着急。忽然前面开来一辆汽车，是师

首长派来接掉队人员的。张梓等人坐上汽车很快就到了湘黔、黔桂公路会合处的干把哨。但见公路两侧摆着好几十辆国民党的军车，全都是我军部队缴获的。

为了缴获这批汽车，师前卫 138 团颇还费了一番心思。并引出了一个颇有点传奇色彩的故事。138 团到了这里以后，俘获了 1 辆美式中吉普。从俘虏口中得悉，有 40 余辆军车即将开来。团参谋长刘凤鸣带着警卫连和轮训队，埋伏在公路两旁，但等了好久，还不见车队开到。刘参谋长追问俘虏，俘虏说，车队是和他们一道开出的，可能是摸不清前面的情况，不敢开快。

刘参谋长想了想，为了争取时间，便决定主动去“迎接”。他带着 1 个班摘掉帽徽和胸章，坐上中吉普，命令俘虏的驾驶员往回开。走出二、三十里，国民党的车队迎面开来了，车上坐的全是国民党兵。

刘参谋长坐着吉普车迎上前去，1 个敌军官从驾驶室的车窗里伸出头来发问：

“前面有没有情况，共军还有多远？”

刘参谋长机智地回答：

“共军快要到了，你们要开快点，不然就过不去了。”

敌军官一听共军快到了，不再多问，立即命令驾驶员加大油门，急驶而去。后面的车队也一辆接一辆加速开了过来。

刘参谋长坐的那辆中吉普就在车队后面紧跟着。车队到了干把哨，此时警卫连长刘子正也换上了国民党军官的服装，站在公路上，指挥车队开进了我军的伏击圈。

警卫连和轮训队的战士们，早已在公路两侧把机枪架好了。当车队开到跟前时，战士们大喊：

“停车！”

“缴枪不杀！”

就这样，40 多辆车全部成了我军的猎获物，车上的敌人乖乖地当了俘虏。

有了汽车，就大大提高了我军的进军速度。战士们跳上汽车，边打边走，直抵贵定，当天就解放了贵定县城。46 师师部又利用这批汽车，来回接送部队，加快了全师前进的速度。

11 月 14 日下午，46 师师长齐丁根和政委范阳春带着师部到达龙里，正准备集结部队解放贵阳。这时，前卫 138 团由贵阳发来电报，说他们已占领贵阳，敌人已于 14 日上午放弃贵阳，向西逃窜。并报告说该团正经贵阳继续向清镇方向前进。

这个消息一传开，干部战士都忘却了连续行军的疲劳，一个个高兴得跳了起来。正在这时，16 军副政委吴实赶到了 46 师师部，他马上指示说：

“贵阳是贵州的省会，国民党早有应变部署，要防止潜伏的敌人破坏，你们的责任很大，全师要赶快进城，维持社会秩序，保证城市安全。”

为了和贵阳人民见好面，全师除 138 团已先行外，136 团、137 团及师直属队在图云关集结，准备举行入城式。指战员们整理服装和个人卫生，步枪上好刺刀，脱掉枪炮衣，以团为单位集中军号，以军旗为前导，整个部队排成 3 路纵队，威武雄壮，浩浩荡荡地向市区进发。

贵阳市地下党组织的学生队伍和各界人士代表，打着“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幅标语，在油榨街欢迎大军。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上还贴有署名“江

汉军区贵州支部”写的欢迎标语。

部队沿着纪念塔、大南门、大十字，到达铜像台。一路上，战旗飘扬，军号嘹亮，战士们唱着军歌，喊着口号，以整齐的步伐向前行进。

但见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欢呼声、锣鼓声、鼓掌声、鞭炮声交织在一起，整个贵阳市都沸腾了。

指战员们目睹这种盛况，眼里抑制不住激动的泪花。部队到达入城式的终点铜像台后，群众纷纷把指战员们围了起来，问这问那。有的还拿来了国民党的报纸叫战士们看，上面登着一条消息，说共军在黔东鹅翅膀遭到强大阻击。

干部战士看后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贵阳已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国民党却还在闭着眼睛说瞎话。

接着，我16军出兵进占毕节，并以一部迅速入川，这就彻底封死了向南逃跑的退路。我军至此形成了对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关门打狗之势。

紧追不舍

1949年11月，我2野16军刚刚解放了贵州省会贵阳，就接到了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关于入川作战的命令。

入川作战的消息传到部队，140团的干部战士那种高兴劲真是无法形容，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一步跨到四川去，痛痛快快地打几个漂亮仗。也难怪，我140团虽说一进贵州就一直担任前卫团，可是直到拿下贵阳，像样的仗一次也没有打过，战士们早就憋得嗷嗷叫。一听要打仗，谁能不高兴？战士们都说，听到入川作战的消息，真像大热天吃了冰凌子——又舒坦又解渴。

野战军通报的敌情表明：自我2野挥戈南下，先后分多路进入西南各省以后，国民党在四川的宋希濂、罗广文等部眼看大势已去，既感到末日来临，异常惊恐，又想苟延残喘，逃避被歼的命运。于是纷纷向滇黔边境撤退，妄图经云南逃往国外。加之从西北窜来的胡宗南残部也到了四川，其目的显然也是往境外逃跑。

刘、邓首长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毅然决定在四川腹地，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歼灭这股敌军，彻底解放大西南，切断敌军的退路，“关门打狗”，给敌人来个“一窝端”。

看来，这次捞几条“大鱼”是不成问题的了。

1949年11月中旬，16军部队离开贵阳，向四川进发。不到10天，就经黔西、毕节，进到川黔边界的赤水河地域。

过了赤水河就入川南了。但是，前面等待我军的却是险峻的云盘山，这是整个行程中最艰难的一段。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云盘山，顶着天，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特别是那海拔1700多米的雪山关，更是峻峭挺拔，耸入云霄，看一眼都使人目眩神摇。

一大早，队伍出发了，当战士们翻越险关时，宣传队员们就打起清脆的竹板，唱起连夜编写的快板，为战士们鼓劲：

“竹板响，响连天，走过小路爬大山，为的是，把那逃跑的敌人连窝端，完全、彻底解放大西南……”

“走山路，不要慌，一步一步往前量，翻大山，进四川，定叫残敌早完

蛋。”

部队的行进速度出乎意外的快，中午，我 140 团就到了雪山关关口，算算行程，不多不少 40 里。这时战士们不禁欢呼起来：

“加油啊，到关口啦！”

“再加一把劲，关口上见！”

爬上关口，大家正准备休息，尖兵连前来报告：从当地群众中了解到，前方可能驻有不少敌军。早就想打仗的战士们，不顾疲劳，个个争先恐后地跑来向团党委请战。

团党委决定：上！不能让敌人从眼皮下跑掉。

战士们立即整装，飞速下山。很快，担任前卫的 4 连，在后山铺兜住了敌人 1 个连，光俘虏就抓了 80 多。经审问才知道，这股敌人属国民党第 6 编练司令部的后卫，主力 2000 多人驻在距后山铺 20 多里的母猪洞。

140 团原准备部队到了后山铺就宿营，现在遇到了新的情况，随即决定：放弃宿营，继续前进，抓住战机，全歼这股逃敌。1 个多小时后，部队赶到了母猪洞。

母猪洞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影，街道上丢弃着毁坏了的家具、炊具，到处是一堆一堆的马粪和稻草屑，在一个临时挖成的地灶旁，猪毛、猪杂碎扔了一地，灶里的灰烬还在冒着丝青烟。看来敌人刚走不长时间。唐成海找到几个隐蔽起来的群众了解了一下，也证实了这个情况，敌人大概向叙永县城方向逃去了。

团党委毅然决定，再次放弃宿营，乘敌立足未稳，实行夜间奔袭。

说也怪，在母猪洞，战士们好像已经散了架一样，但党委决议一下达，大家又一个个精神抖擞，快步如飞，活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唐成海心想，我军的战士是何等可爱，他们明明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次 70 里的强行军，一场激烈的厮杀搏斗，但没人皱一下眉头，没人叫一声苦，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啊！我军的每次胜利，不都是他们这种精神的结晶么？

当夜幕笼罩大地的时候，2 营来到了狮子山，在大石桥又兜住了一个准备炸桥的敌工兵排。这下更给十分气愤的战士火上加了油：

“狗日的还要炸桥哩，想的美！”

“还是美国炸药哩，他的干爸爸也救不了他们的命！”

唐成海看着那已经安放在桥墩上的“TNT”炸药，听着那河水的波涛声，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兵贵神速”啊，如果我军稍迟一步，那后果将是什么呢？

据敌俘虏供认：这股敌人既有第 6 编练司令部的，也有 72 军的一部分，由一个叫做肖以党的中将司令带着，准备经这里入云南逃跑。昨天晚上，他们知道我军到了赤水河，所以今天就逃往叙永城。他们以为我军还在 170 里以外，最快也要明天中午才能赶到叙永，因而戒备疏忽，除了派这个工兵排炸桥外，其余全部在城里宿营……。

叙永城略呈正方形，永宁河从中穿过，把全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傍山，西部较开阔，周围有一道不高的城墙环绕。据敌工兵排的俘虏供称，敌军除在城东部布置了一个营以外，大部都在城西北和北门外，在南门附近只有 72 军的 1 个连，敌编练司令部设在城中心的一个银行里。

针对这种情况，团党委决定：

1 营提前出发，向城东迂回，隐蔽待命，等正面一打响，冲入城内，攻敌侧背；

2 营实施正面强攻，夺取南门后，迅速袭击敌司令部和县政府，首先打乱敌军指挥机构；

3 营继 2 营之后入城，以最快的速度穿城而过，插到城北，断敌退路。第二天凌晨两点发起总攻击。

1 营走后，唐成海带 2 营很快到城南门外的大路两侧隐蔽待机。被黑夜裹得严严实实的城南关，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只有那秋虫偶尔“叽叽”低吟几声。战士们忍住极度的疲乏，焦急地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

总攻时间——12 月 1 日凌晨 2 时终于到了。唐成海喊了声“出击！”战士们立刻一跃而起，如离弦之箭，扑向南门，攻进城里。4 连首先攻击敌编练司令部。战士们冲进去没打一枪，就俘虏了一群敌军军官。那个中将司令肖以觉，吓得钻到了床底下，战士们揪住他的两只脚往外拉，他吓得屁滚尿流，连声喊：“我投降……投降……”

5、6 两个连的目标是城南 72 军那个连。我机智勇敢的战士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摸掉哨兵，一下冲进了敌人睡觉的房子，大喊一声“不准动！”房里的 100 多敌军全都乖乖地做了俘虏。

最可笑的是敌连长，当战士们冲进他的房子，命令他缴枪时，他竟睡眼朦胧地发火说：“别胡闹，共军还远着呢！”待我军战士雪亮的刺刀逼到他胸口时，他才忙不迭地举起了双手。

再说我 1、3 营，这时也都进了城。1 营从东门压过来，打得敌人鬼哭狼嚎；3 营不顾街道上流弹横飞，直插北门，很快就占据了有利地形，筑起了阻击敌人的工事。这一下，城里的敌人乱了阵，东奔西突，四处逃窜。但跑到哪里，哪里就留下一具具尸体。

不到两小时，2300 多敌军就投降的投降，消灭的消灭，全部解决了。

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天亮了，灿烂的朝霞照耀着大地。战士们把那个中将司令押到唐成海的面前，只见他头上没有帽子，肩章也只剩了 1 个，脸色像张白纸，浑身不住地哆嗦，说话也不成句了。唐成海看到他那付狼狈相，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他和他的部下所犯的罪行；笑的是如果他以这副“尊容”去见蒋介石，还不知会出什么洋相哩。

飞鹰抓山鸡

1949 年 11 月，华南战场上，随着敌鲁道源兵团企图逃往雷州半岛的迷梦被我军粉碎后，敌张涂兵团的侧翼也被我军砍得支离破碎，这就迫使敌人不得不掉头西向，改变原来逃窜的一切计划。30 日，我 43 军收到林彪拍来的加急电报：

“拚命地追，紧紧地咬住敌人，直追到底，不彻底全部消灭敌人，决不收兵”。

我 43 军猛扑博白县城。

队伍像一股无敌的洪流，在苍茫的夜色中，四处黑黝黝的道路上奔腾前进。秋夜的虫鸣声，被我军雄壮的沙沙的急进步伐，吓得消声匿迹了。连续追了 90 公里，敌人尚在迷梦中，我军却已胜利地赶到了博白城下。一堵丝风难透的包围铁壁，结结实实地罩住了敌人。

伪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原是白崇禧十分欣赏的干将，可是在我军布就的天罗地网下，一个曾经杀人盈野迷信武力的屠夫，现在已变成一个迷信天命的愚蠢的家伙了。

前两天，张淦抱头窜至博白以后，就在县城南端的一座大院里，安下了个1米多宽的罗盘，怀着烦躁的心情，两手支撑着下颚，闷坐屋里凝视着罗盘抖动的针头，卜算着自己逃窜路线的凶吉，筹划着脱网的诡计，喃喃地向老天祈祷着。

他的参谋给他送来一份情报，并向他请示行动指示。

“共军先头部队离我们还有多远？”他问。

“最近的距离是90公里。”参谋回答。

“这些日子，我们跑得太累了，我们的军队也要休整一下，今天我们就索性在这里多住一天，明天再走吧！”

“报告司令，这有些太冒险了！”

“你真是胆小如鼠，怕什么？我在大别山和共产党已经是老对手了，何况我手下还有本钱，我张某人也并不是好惹的……再说，天无绝人之路，共产党再快，也赶不上我飞驰的吉普，比赛吧！”

张淦似乎从上帝那里得到了鼓励，说着便昂起头来挥挥手作出了最后的决定。然后惨笑地环顾一下四壁，结束了临睡前必有的祈祷仪式。几个月来，他都是这样处于风声鹤唳之中过日子。

张淦为了强作镇定和欺骗人民，进一步鼓舞他的下属和伪政权坚持与人民为敌，还组织召开了一个所谓的民众大会。会上，他拍着自己的胸膛自吹自擂说：

“我张某人统率大军一二十万，打遍天南地北，创造出许多辉煌战绩，使共军闻声丧胆。目前为了执行总统的战略方针，回师故乡，与父老们共存亡。人说共军厉害，其实未免是言过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手下还有几个军，我的大炮并不是哑巴，枪也有个洞口……”

此时，我128师382团奉上级指挥部命令，由后备队改为前卫，向玉林地区疾进。

傍晚时分，部队赶到了博白县的苏立圩。团长张实杰命令部队停下宿营。

就在这时，从博白方向出现了不少行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个个脚步匆匆，神色慌张。张实杰好生奇怪：莫不是碰上了国民党残兵？

张实杰一问才知道，白崇禧第3兵团司令张淦在博白城，敲钱抓丁，为非作歹，搞得鸡犬不宁。

“噢，张淦在博白？”

“唔，他在博白已有几天了。还开什么祝捷大会，胡说他们在廉江打了胜仗，抓了几千名解放军。还让解放军在街上游行，给老百姓看，实际上都是广西兵装的。”

“张淦都说些什么？”

“张淦信神信鬼。听说前几天他去庙里求了一柱上上的签，便架起喇叭在县图书馆门口大喊大叫，说这几天一定要打败共产党。”

这情报对我军来说太重要了。

夜幕很快就降下来了。天空一片深蓝，明月如银勾西挂，四周都显得很静。

在这宁静的夜晚，部队行动了。

2 个小时的急行军，部队就行程 20 多公里，如尖刀插进了博白城。此时正是三更半夜，万籁俱寂，又恰遇上弦月西坠，城内外伸手不见五指。还在做着好梦的敌第 3 兵团炮兵营，把我军误认为是“自己人”，大大咧咧地质问我军：

“×你妈！你们 58 军退到这里干什么？”

“奉上级命令，我们 11 兵团来协助你们到东边打解放军。”我军将计就计，蒙骗敌人。

“那好，快去吧！”

“弟兄们快告诉我，张司令官在哪？我有紧急情况要向他报告。”副连长芦福山问道。见敌兵没人吭声，芦福山又说：“谁人带路，我赏他 5 块大洋。”

这一着真灵，马上就有几个国民党兵争着当向导。芦福山指着一个小个子说：

“这位兄弟，你既然那么熟悉，就劳你的大驾吧！赏钱分给大家花。”其他的敌人这才不再争执。

小个子敌兵带着芦福山等人顺大街南去，又折向东南，来到图书馆门前。站岗的哨兵喝问芦福山是哪一部分的？芦福山镇定自若地回答：

“兄弟是 11 兵团团部通信兵，有急事要报告张司令官。”

敌哨兵说：

“别急，我先通报一声再进去。”

由于芦福山带的人多，引起了敌人警觉。本来就惊魂未定的一个敌兵见情况有异，便大声喊道：

“不好啦，解放军进城啦！”

可是，麻木、糊涂的敌第 3 兵团作战处长却从房子里跑了出来说：

“胡说什么？解放军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别误会，肯定是自己的兄弟。”

敌长处话音刚落，7 连 1 排的同志便一个箭步冲到他跟前，下了他的枪，并逼着他带路去抓张淦。与此同时，其他人一拥而上，不费一枪一弹，三下五除二便俘虏了敌第 3 兵团司令部大部官兵。

这一下，惊动了住在后院的张淦。他拍案而起，对身边的参谋说：

“我们前面还有 4 个军守着，东北方向的解放军还在 90 公里外，怎么突然冒了解放军呢？”

但是，张淦的吼叫还没完，我 7 连的战士已冲到后院前。一敌兵见状大喊：

“解放军！解……”

张淦训斥道：

“喊什么？不要误会，是自己人。”

张淦毫无戒备，我 7 连战士呼的一下就扑到张淦的院子门外。张淦这才恍然大悟，惊慌失措，像被袭的鸵鸟一般往床底下就钻。敌哨兵赶紧关上大门，负隅顽抗。

7 连用火箭筒破门。随着“轰轰”两声巨响，大门被炸得粉碎。芦福山冒着硝烟率队直闯院内。

“张淦快投降！解放军宽待俘虏！你们放下武器，保证人身安全！”

张淦在床下吓得就像筛糠似的直抖。芦福山向前踢了踢他露在外边的双脚，并将他拖出床底。张淦不知所措，战战兢兢地举起双手，结结巴巴地说：

“兄弟投降，请解放军饶恕！”

芦福山叫张淦命令敌军放下武器，尔后把他押到团部。

王政委严肃地说：

“我军的宗旨你是知道的，对放下武器自动缴械的官兵不论大小一律宽待。”

接着，王政委吩咐警卫员何万利搬个凳子让他坐下，又叫军医崔廷贵给张淦包扎伤口。

对我军行动如此迅速，张淦钦佩地说：

“贵军神兵！我以为你们3天内不会赶到。没想到现在就从天而降，真是神兵！真是神兵啊！”

这时，7连将张淦的女儿送到指挥部来了。

张淦抬头见是自己的女儿，又惊又喜。张淦的女儿急忙走向前去，抱着父亲放声大哭。张淦轻轻推开女儿，连声说：

“解放军真好！解放军真好！这么宽待我们，我要将功赎罪，为解放军效劳。来，孩子，快给解放军长官磕个头。”然后，张淦把他的决定说了：

“我立即命令我兵团所属各军，迅速放下武器向贵军投降。”

说毕，张淦即刻拟就电文，交给早已准备好的敌台发出。张淦的亲笔电文化作电波传给了张淦所部的第7军、第48军和第126军。

这时，张淦所部的上述各个军正与我军4兵团在廉江和陆川一线对峙着。

因为双方兵力基本相等，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此时此刻，双方都在拼命争夺战略要地——湛江和钦州地域。如果我聚歼了张淦兵团，占领了这一带地方，那就打破了白崇禧部逃去海南岛乞求美援和我长期对抗的阴谋。相反，如果让张淦兵团占住该地，我则无法围歼白崇禧的20万兵马于大陆，后患无穷。

11月30日凌晨张淦被围时，曾向敌第7军、第126军发过速来解围的电报。这两个军受命后即向博白撤退，使湛江和钦州一线敌我兵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2月1日，张淦的令降电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变化。顷刻间，敌人降的降，逃的逃，顽固不化的也无心恋战，崩溃之势便形成了。正像战士们的顺口溜所形容的：

我们是飞鹰，
张淦是山鸡。
飞鹰抓山鸡，
巧妙又神奇。

歼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

1949年11月，我43军在博白稍事休息后，遂在军党委提出的“继续前进，彻底消灭残敌”的号召下，配合着兄弟兵团，乘胜挥戈直向湛江迈进。

人说南方四季如春，但冬天还是寒冷的。

我军在泥泞的道路上前进，在北风呼呼的狂吹下，不畏天气严寒，个个斗志昂扬、精神抖擞，涉过无数道冰冷的激流，爬过数不尽的高山峻岭，穷追猛打，直指敌人逃跑的方向。夜来霜雾迷蒙，找不到房子，战士们就侧身在冰冷的荒山野岭里睡几分钟，然后纵起身来再继续前进。真是天寒地冻，

浇不熄勇士们胸中的革命烈火；关山阻隔，也挡不住英雄们的去路。我神勇大军以7小时60公里的行速直向海防重镇——北海市进军。

正当敌暂5军第23军惨无人道地对北海进行蹂躏的时候，我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消灭了3000多准备逃跑的敌人。从此，北海获得了新生。

这时，我127师379团7连在钦州通往灵山的公路上，打下敌人七八十辆大汽车。带有“USA”字样的美国军用大汽车、吉普车、水陆两用汽车，摆满公路。汽车上拖载着崭新的美制重炮、机枪、步枪、电台、工兵器材、弹药等等数不清的军需物资，还有几十辆大汽车，装着满满的汽油桶（其实桶里全是鸦片烟土）。

地上，皮箱、行李、家具、料子衣服、高跟鞋，甚至锅碗瓢盆、鸡鸭鹅狗、女人皮包、小镜子、口红、胭脂，应有尽有。真像战士们说的：抄白崇禧老家了。

在公路边上，一群群敌军军官及其家眷，有的在生火烧饭，有的守着皮箱、包袱痛哭。那些太太小姐们，一个个蓬头散发，满面污垢，狼狈之极。

敌机飞来俯冲扫射时，这些太太、小姐一个个吓得尖声叫着，乱藏乱躲，丑态百出，有的把高跟鞋跑丢了，打着赤脚跑。她们本来都穿着旗袍、短裙，现在很多人裹着毯子，把破棉袄披在身上。由于不时下一场毛毛雨，这些人显得倍加凄苦、沮丧。

这时，一个烫着发的官太太对我看守的解放军战士说：

“白崇禧这个老混蛋，叫我们跑出这么远来当俘虏，早知道这样，不如在湖南当俘虏好，离家还近。这里老百姓说话也不懂，都恨我们，即使解放军放了我們，半路还不叫老百姓杀了，怎么办呢？”

官太太越说越伤心，捂着脸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一个矮胖的俘虏过来宽慰她说：

“算了吧，别哭了，你应该感谢解放军来得快，虽然离家远点，总算是大陆，比跑到台湾强得多呢。”

一个秃头顶的少将军官走过来对我工作人员套近乎说：

“我认识你们的司令员林彪，他是我黄埔军校的同学。”

据师司令部清查，在这里被我军歼灭的有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5个兵团的“联合总后勤部”，以及“内政部”、“国防突击纵队”、“机械化兵210团”、“将校军官训练队”等。敌人认为这一路最保险，才把他们的家底子安排在这里逃跑。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接着，我45军又消灭了企图逃越困境的敌第97军。

敌第1、第10兵团余部西逃后，我第13军即由钦州向防城、东兴方向追击，第43军129师和127师380团由钦州以北向上思方向追击，第39军117师和115师由南宁向龙州方向追歼敌第1兵团，其余各军即于现地打扫战场，清剿溃散之敌。

此时，我军连战皆捷，各部队勇猛歼敌，锐不可挡。

第13军12月8日解放防城、上思，9日解放东兴、思乐。接着该军主力进入十万大山清剿溃散之敌。

第39军117师12月8日在上思地区将敌保安团和第71军军直及88师一部歼灭。第115师9日于绥淦以西将敌第71军残部全歼，俘敌军长熊新民，并于思乐地区歼敌第14军63师残部，10日占领宁明，11日于旭唐地区歼敌33师残部，迫敌第303师师长秦国祥率部投降，凭祥和越边境重镇——镇

南关被解放。

第43军129师12月8日在蓬楼、龙楼地区歼敌第46军188师残部后，即奉命向中越边界追歼逃敌，13日进至隘店，14日歼敌第97军军部及33师、82师残部，俘敌副军长郭文烂等。

与此同时，我军俘敌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李本一、第48军军长张文鸿等。

至此，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广西战役历时34天，全歼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部及直属部队3个兵团部、12个军部、25个师另15个团，歼灭两个兵团部和10个师的大部，共17.3万余人。

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旗高高地插上祖国的边疆，迎风飘扬；巍峨雄伟的十万大山开始了它如花似锦的前程。

西南三巨头，一起举大义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的阵阵号角声中，1949年12月9日，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和潘文华率所部第24军、95军和第235师，在周恩来、刘伯承、邓小平派遣的地下工作人员的策动下，利用解放军大军压境之际，摆脱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于四川省彭县起义，打响了川、康（四川在解放前分为四川、西康两省）境内国民党军队起义第一枪，促进了西南解放的进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人民解放军在向西南进军之前，第2野战军根据毛主席关于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方式的指示，先后派出一批敌工人员潜入到四川的国民党部队中，进行瓦解敌军、组织起义的工作。

第一个被派出的是黄实，他是原四川《每周时报》社社长、国民党第95军军长黄隐之侄。1949年7月参加解放军，8月便被第2野战军派往邓锡侯部去工作，因为第95军是邓锡侯的嫡系部队。他从南京出发，经武汉、南昌，通过巫山转重庆，一路晓行夜宿，跋山涉水，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关卡，终于在9月初到达成都，找到他父亲黄慕颜。

黄慕颜，与2野司令员刘伯承是老相识。1926年12月顺（顺庆、南充）泸（州）起义时，刘伯承任总指挥，黄任副总指挥，后因起义失败到了武汉，刘伯承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黄任副军长。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很熟。

黄实见到父亲，未及多叙亲情，即开门见山地说：

“刘伯承司令员要我回四川找你，策动邓锡侯部第95军起义，响应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

接着，黄实从鞋底取出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写给邓锡侯嘱咐他及时准备、争取光荣起义的信，交给他父亲转给邓锡侯。

黄慕颜早年即受革命思想影响，倾向进步，马上高兴地答应说：

“策动95军起义，使双方都少流血，使人民少遭难，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事，于国、于家均有利，不要说刘伯承叫我做，我自己也应该做，也有条件做！”

于是黄慕颜便立即去找95军军长、他的二哥黄隐，告诉他黄实回来了。

黄隐眼看着南京解放，李宗仁逃往广州，形势不妙，想投靠人民，又没有找到可靠的牵线人，正卧病在床，徬徨不定。此时真是久旱逢甘雨，病也

好了几分，马上让黄实去见他。

再说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因其家属财产都在成都，不愿轻易舍弃，所以难下出去香港、台湾之心。但又耽心他曾打过红军，共产党不会饶恕他，正处在十字路口的徘徊之中。

这时，黄实根据他父亲的意见，先将张澜的密信交去，看看邓锡侯的态度再说。邓锡侯接到密信后，立即派座车接黄家父子来家，向黄实详细询问了刘、邓首长的情况，黄实就顺势向邓锡侯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对他的三点希望：一、即早联络刘文辉、潘文华等四川的地方实力派抵制胡宗南入川，宣布川、康起义；二、俟解放军逼境时，待机起义，配合解放军围歼胡宗南部或断其后；三、保护好成都地区工厂、仓库、文化古迹以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这座文化古城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邓锡侯当即表示：

“我个人年事已高，已无所求，但为保护桑梓，定相机行事。力争共军逼近时，率 95 军袍泽宣布起义。”

刘伯承、邓小平这两位四川老乡，十分关心策动刘文辉等四川和西康地方实力派起义一事，认为这对加速川康两省的解放将具有重大意义。又接连派出三批人员前往四川。

9 月底，解放军 2 野司令部情报处的周超（化名章浩然，后来大家都叫他小章）经黔江、涪陵到达成都，按照事先规定的方法与黄实取得了联系，带来了与 2 野司令部电台联络的呼号和密码，还传达 2 野司令部的指示：鉴于北线第 1 野战军和南线第 2 野战军已向西南地区作全线战略推进，要加快工作的进程。

10 月初，解放军 2 野又派遣朱德钦、林蜀秀抵蓉，他们通过进步人士朱彦林去做邓锡侯的工作。又经朱彦林介绍，由王作宾去做刘文辉的工作。11 月下旬，为了进一步做好刘文辉、邓锡侯的工作，解放军 2 野又派赵力群来蓉，和刘文辉、邓锡侯具体商谈了与解放军配合行动的问题。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工作，邓锡侯、黄隐所部第 95 军的起义准备工作大体就绪。

在 2 野策动邓锡侯部起义的同时，周恩来指示驻在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部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要王争取刘文辉联合西南实力派一道起义。

经过王少春阐明利害，刘文辉明确表示了起义的态度。王少春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机宜。刘文辉所部 24 军的参谋长杨家桢建议刘文辉把情况报告周恩来，并请示今后的行动。刘文辉考虑再三，指示杨家桢拟了电文交王少春报告周恩来。电文大意是：年来受蒋压迫，积怨难言，处境困难，只好暗作准备。今已与邓锡侯等部约好，决定投向人民，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

很快，王少春的电台收到了周恩来给刘文辉的指示电：我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现在再来看看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他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回到成都后，中共地下党留蓉工作部即派外围组织“新建社”成员赵星洲（潘的姨表侄），做潘文华的工作，策动潘起义。经过反复工作，释去了潘的疑虑，潘写下了“拥护共产党”5 个大字，并派其子潘清洋到赵星洲家会晤中共地下党留蓉工作部副支部书记吕修振，具体研究了起义部署。决定由潘清洋密电其兄潘清洲起义，通知保安团长张豫波来接受任务。并请“蓉工部”搬进

他家，以便掩护和联系。潘文华表示对共产党的信任，把他的周夫人送回游击队活动的仁寿县文公场老家，把二太太安置在赵星洲家。

10月下旬，刘文辉在雅安同王少春对形势作了研究，商量修改了起义的具体步骤、方法及对蒋介石的策略，便从雅安到成都，向邓锡侯、潘文华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并商定以他们三人为核心，联合一切反蒋力量，在解放军到来时，相机起义，配合行动。同时研究了对蒋介石所应采取的对策。

至此，以刘、邓、潘为首的川康地方实力派的联合起义，基本成为定局。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于30日一举解放了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重庆市，蒋介石当天逃到成都。

蒋介石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妄图作最后挣扎，刘文辉、邓锡侯等则曲意奉迎，巧作周旋。

12月11日，各方人士于龙兴寺召开了一次较大的会议，商定起义后的决策：一、如蒋、胡军破坏蓉城，当不顾一切，断然予以攻击。二、待解放军进至1日之行程内，即配合解放军采取攻势。三、在解放军未到达前，敌如向我进攻，则以一部配合武装民众，袭击其侧背，以主力退守西山山地待援，并采取政治攻势。四、胡宗南部未向我进攻，且解放军亦未到适当距离时，则向胡部严密警戒，确保崇、彭、新、灌，并在政治方面采取攻势，以牵制胡部之兵力，策反其部队，消除其战意，以促成其迅速崩溃。五、通电表态，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走向人民方面；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司令员号召，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并号召其他部队起义；起义部队以原编制、原番号就地待命；给养问题，由刘、邓、潘致函各专员、县长供应，并遵守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刘文辉等人起义的进展情况。12月5日，周恩来电告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刘文辉的字，编者注）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响应刘、邓两将军11月24日的‘四项号召’。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万一窜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

刘文辉在12月7日离开成都时，派一名副官将拟好的起义通电稿送雅安杨家桢。12月9日，通知王少春发出。

接着，刘、邓、潘三部的将领黄隐、谢无圻、杨晒轩、陈离、马毓智、万里、刘元、伍培英、刘元琮、潘清洲、严啸虎、潘大迥等亦发出通电拥护起义。

春城天日开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策动下，毅然率部起义，从而关闭了国民党军逃往缅甸的大门。这一义举，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昆明起义”。

1946年至1949年，卢汉深感处处受国民党中央的排挤和控制，久已心怀不满。1948年底，滇军60军在长春起义，93军在锦州被歼，这使卢汉大为震惊。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全国节节胜利，云南境内的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武装力量蓬勃发展，以及云南人民要求解放的愿望，都在强烈的影响着卢汉。卢汉依托国民党蒋介石的信心彻底动摇，使他不得

不另寻出路。

为了促成卢汉的起义，必须物色合适的人选，做卢汉的工作。

周体仁原为国民党傅作义部一个集团军的兵团副司令，后任北平市警备总司令，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起义后为人民解放军北平警备副司令员，对北平市的社会治安、文物、公共设施的保护作出了积极贡献。周体仁是云南景谷县人，傣族，与龙云、卢汉等较熟，经朱总司令推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派遣他到云南策动卢汉将军起义。

10月初，周体仁第一次悄悄地拜访了卢汉将军，试探卢汉对起义的态度，并向卢汉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和傅作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情况。

卢汉得知共产党、解放军对傅作义等将领的宽宏态度和对傅作义委以重任感到欣慰。但又不无忧虑地向周表示：

“再打下去不是办法，起义是条出路，但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已解放，这时起义恐已晚矣。”

周体仁以北平的和平解放为例，向他说明：

“当时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傅作义才准备起义，中共还是接受傅将军的起义，何况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还未到达云南，起义还是不迟的。”

10月中旬，卢汉又约见周体仁，向周表示了率部起义的愿望，但又面带难色地说：

“中共中央曾通过香港有关人士同我有过联系，但不知何故联系中断，是否由于昆明发生了一些事情，使中共方面改变了态度？目前的最大问题是与中共中央联络不上。”

周体仁当即表示：

“如果卢汉将军决心起义，我愿意为将军与中共方面搭桥。”

由于刚经过“九九整肃”，蒋介石曾于9月初在重庆与卢汉进行过密谈，恐卢汉有变，周体仁只字不提自己是受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委派的。

与此同时，周体仁对卢汉及其部下起义的可能性进行了一些调查，接触了一些云南政界人士和将领。特别是同龙泽汇、曾恕怀、谢崇文等进行了接触，了解了一些情况，感到卢汉及其部下对起义是有诚意的。于是，周体仁第三次晋见卢汉将军，这次，他如实向卢汉说明，自己是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委托前来昆明与卢汉将军面商云南和平解放大计的，并转达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希望，请卢汉将军率部起义，为云南的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

卢汉将军得悉周体仁是受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委托来同他面商起义大计时，感到十分惊喜，决心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立即举行起义。周体仁又向卢汉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云南举行起义的最好时机是在人民解放军消灭蒋介石的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军之后，向云南进军之时，起义部队可配合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在云南的中央军。蒋介石还企图以云、贵、川、桂为基地组织最后防线，阻止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对此，望卢将军高度警惕。

昆明起义最大的障碍是国民党中央军新8军、26军和宪兵部队。

卢汉同周体仁商量后，拟定了起义计划：由卢汉将军以云南绥靖公署主任身份，以阻击人民解放军入滇为理由，命令新8军开赴滇黔桂边界，26军开赴滇桂边界，将该两军调离交通沿线和昆明地区；将驻大理的卢汉第74

军（余建勋部）调驻昆明地区协同 93 军（龙泽汇部）保卫昆明，待命起义。以龙、余两军消灭昆明的国民党宪、警武装及其他国民党驻昆机构。这样，起义部队可以配合人民解放军将新 8 军、26 军夹击歼灭于滇、黔、桂边界地区。在此期间要坚决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其他部队进入云南。起义时间预定为 1949 年 12 月 15 日左右（后因情况变化，起义提前实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到 11 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这时，云南各地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更加高涨。在城市，工人、学生、街道居民都纷纷走上街头，散传单，写标语，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民主，要求解放；在广阔的农村，革命活动也很活跃，到处流传着“桃花开，李花开，桃李百花开，迎接解放大军进山寨”的歌声。人民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震动着三迤城乡。

12 月 9 日，卢汉接到成都来电，得知张群将来昆明。根据当前形势，他认为这是千载一时的天赐良机，当机立断：马上起义。卢汉又故示镇静，施放烟幕，以迷惑蒋介石在昆军政人员和特务的耳目，特于当天下午在私宅大摆筵席，宴请美国驻滇总领事陆德瑾和副领事，英国总领事海明威，法国总领事戴国栋。汽车盈门，宾主尽欢，谁能想到事变就在眼前？

颇有韬略的卢汉准备趁张群大驾光临之际，假借张群召集开会之名，把蒋介石在昆的军政首脑这些“大鱼”一网打尽。

8 点 50 分，应通知“开会”的人纷纷到来，被全部扣捕。被扣捕的人员名单如下：

李弥，国民党第 6 编练司令兼第 8 军军长。

余程万，国民党第 26 军军长。

石补天，26 军 93 师师长、已升 26 军副军长。

沈醉，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

李楚藩，宪兵西南区副司令。

童鹤岑，宪兵西南区参谋长。

沈延世，空军第 5 路军副司令（以上 7 人参加开会）。

蒋绍禹，昆明航空总站站长。此人未参加开会，是在新公馆外面，坐在吉普车上等他的副司令沈延世时被抓着的。

9 日 22 时，卢汉发出了起义通电。

卢汉起义后，因张群是自己的老长官之故，让他搭乘飞机去了香港，成了一件憾事。后来，卢汉在北京见到毛主席时，向毛主席承认了错误。毛主席笑着说：“人非圣贤，岂能无错，知道错了改了就好”。原谅了卢汉的错误。

我看只能和谈

1949 年，当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发展，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残余势力之时，百年来控制我国西藏的走狗们，恐惧了，战栗了。他们想利用西藏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缺乏了解，大造“共产党是青面獠牙、绿眉红眼、吃人恶魔”等等荒诞谣言，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企图制造所谓“西藏独立”，妄想使西藏人民脱离祖国，永久成为他们的奴隶。于是，西藏反动派和国民党特务，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煽动他们培植的反动分子，掀起了一股“西藏独立”的逆流，大肆进行罪恶的分

裂活动。

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迫切要求西藏上层人物做出对西藏前途的选择。为此，西藏地方政府召开官员扩大会议，专门商讨西藏何去何从的问题。阿沛·阿旺晋美作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大孜本之一的主要官员，参加了会议。会上，许多头人以社会上流传的诬蔑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谣言为根据，坚决主张不同共产党谈判；有的人甚至提出动用武力，截断人民解放军进藏道路，以武力同共产党相抗衡的想法。

阿沛·阿旺晋美针对这些离奇的想法，勇敢地站出来陈述着自己的不同看法和主张，令不少官员为之叹服。他说：“社会上流传的那些事，我是不信的，我相信共产党是人而不是魔鬼。反过来讲，权且共产党真的像有人讲的那样，又假设他们有1亿人，那么4亿5千万中国人还有3亿5千万不是共产党。我们常说：‘针能过去的，线也能过去’。3亿5千万人同共产党相处，能过得去，我们西藏100多万人也能过得去。至于说同共产党打，那简直是自我嘲弄。据说国民党有800万军队，还有美国的精良武器，同共产党打了十几年，非但没有打赢，反而被共产党消灭了。西藏男女老少全上阵也不过100万，更没有精良武器，怎么打？我看只能和谈，不能打。”

阿沛·阿旺晋美的真知灼见，有理有据，既消除了人们轻信谣言存有恐惧的心理，又驳斥了那些主张同共产党兵戎相见的错误主张，同时也向人们指明了西藏只能走同共产党进行和谈的光明前途。此后不久，阿沛·阿旺晋美的精辟见解，很快在拉萨上层和市民中传开了，他的“关于和谈”的主张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所承认。

历史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阿沛·阿旺晋美的主张是无比正确的。1950年10月19日，当反动统治者盘踞多年的西藏东部门户——昌都上空飘扬起五星红旗的时候，这个严重的军事打击，迫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在政治上迅速分化，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民族政策，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赴京谈判。经过谈判和协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共同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西藏，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瞒天过海战红河

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形势逼迫、我军事压力和我党的和平政策感召下，率省政府和地方武装宣告起义。残存在云南开远、建水、蒙自、个旧一带之敌26军惊恐不安，企图乘卢汉等待整编，我军主力尚未到达之机，攻占省会昆明，固守待援，然后转向海南岛、越南、老挝、缅甸，以伺机卷土重来。卢汉告急求援，情况十分紧急。

为粉碎敌人的阴谋，12月下旬，中央军委电令38军进至广西百色地区的部队，火速赶到滇边老街地区，切断敌逃向越南的通路，配合兄弟部队，歼敌于滇境地区。

从百色到个旧约有600多公里，沿途山高林密，道路崎岖不平，地形十分复杂。当地民谣说：“对山听鸡叫，要走须一天”我军途经十多座大山，多是原始森林，羊肠小道，部队只能一路纵队行军，先头部队到达了山脚，后卫部队还在山这边，有时部队只好在半山腰露宿。有些大山，海拔高度，

山上和山下相差千余米，气温相差十七八度。冬天在半山腰露宿，冻得战士们直发抖，根本睡不好觉。有时只好采取人不停脚，马不停蹄，人不吃饭，马不喂草地连夜行军。

部队披星载月，忍饥耐寒，经过十余天的急行军，中途又与国民党地方武装战斗两次，于1950年1月17日进至个旧地区，与2野胜利会师了。

当时，友军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歼敌1个师，刚夺下个旧县城。他们介绍情况时说，敌26军军部率1个师向西南逃窜了两天一夜，具体位置不明。

敌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胜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部队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也来不及休整，又继续以强行军的速度向个旧西南方向快速疾进。经过昼夜的急行军，有的同志疲劳过度，有的饿极了，边走边吃苞米花，边打瞌睡；有的跑掉了鞋子，也顾不上去拣。有人写诗描述当时的情景时说：“赶路不怕山高路又陡，追敌那怕天黑看不见，有的摔破头皮不在乎，有的跑掉鞋子不去拣。后面只怕前面追不上敌人，前面只怕后面掉了队，‘跟上’的口令往后传，后面向前传‘跑步’，总嫌前面走的慢……”大家只有一个心眼，豁出掉几斤肉，也要追上逃敌，打一个漂亮的追歼仗。敌人逃了两天两夜，我军硬是用一个晚上撵上了敌人。

151师452团追到离红河约30里的斗姆阁，碰上敌193师579团从红河边派回来的1个营的警戒哨。这几天来，敌人连续长途行军，加上这个营又连夜返回来多走30里山路，这天夜里，早已疲惫不堪，一个个睡得像死猪一样，连哨兵也抱着枪睡觉了。2营副营长张朋年带通信员在前边搜索找向导时，通信员发现敌哨兵，一枪将其击毙，但枪声并没有惊醒熟睡的敌人，等到我们部队逐屋搜索叫醒他们，他们才明白过来，一个个乖乖地缴了械。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远离的解放军，像神兵一样，从天而降。

敌4连长带1个排，住在西南的1个独立草屋，发现我军后，进行顽抗。我军包围草屋，开始用爆破筒炸，爆破筒因受潮不爆炸，想用炸药包炸，可是又没有炸药了；往里扔手榴弹又投掷不进屋去。反复喊话劝降，敌人拒不投降。最后只好用重机枪打燃烧弹，打着了茅草房子，绝大多数敌人都缴械投降，只有敌连长带着两名亲信士兵逃出我包围圈，但走投无路，第二天也自己走来向我军投诚了。这一次战斗，只用了30分钟，歼敌1个营，真是一个干脆利索的漂亮仗。而我军无一伤亡。

敌4连司务长响应我军号召，愿意带罪立功，不但提供了红河两岸的地形敌情和敌军口令，还自告奋勇地为我军带路，直奔敌军军部和主力部队。

红河宽不过百余米，但河深流急，波浪翻滚，是滇南的一道天然屏障。敌26军在红河蛮板渡口架设了浮桥。浮桥是用空气油桶连串起来上面铺设木板做成的便桥，有4米多宽，敌还在红河东岸住1个团的兵力，掩护其军师机关和主力部队逃跑。

红河蛮板渡口是敌逃跑必经之路。敌人在蛮板渡口架上的浮桥是他们的求生之路，如果我军抢占了浮桥就等于扼住了敌人的咽喉，可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将其布置打乱，就掌握了歼敌的主动权。所以，能否控制浮桥，关系整个战斗的成败。如何夺取敌人的浮桥呢？考虑敌兵力多，火力强，我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必须出敌不意，达成突袭巧夺的目的。

当1营追到红河蛮板渡口，天已亮了，太阳升起约有丈把高，茫茫的雾障笼罩着河谷。这时，东岸敌人已开始成两路纵队过浮桥。

这里的早晨雾障大得10米以外看不清人的面部。我军遂决定趁雾障抢过

河去。1连组成1个加强尖兵排，第1班全是冲锋枪，第2班是带刺刀的捷克式步枪，第3班全持轻机枪。

尖刀排在1排长盖万阁同志带领下，尖刀排的勇士们毫不犹豫地插进敌过桥部队行军纵队中间，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对岸扑去。这时过桥的敌人还蒙在鼓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军来得这么快，胆子这么大。敌过桥的部队多，互相拥挤，前面发生堵塞，1班长庄感文机智地大声喊道：“我们机枪连先过河掩护，你们快闪在一边。”有个敌人不让路，发牢骚地说：“都是逃命的，为什么给你们闪道？”1班长火了，猛地把这个敌人推到河里。这时附近的敌人认出我们是谁，慌忙喊道：“解放军上来了！”但敌军官还不相信，骂道：“混蛋！还没有情况就闹内乱。”1连的同志也随机应变附合地说：“都是自己人，不要内乱。”

尖兵排夹在敌人中间过浮桥，处境是异常危险的，但战士们个个沉着机智，临危不乱。有的战士还有意地把两边行军的敌人用胳膊肘拐到河里去。敌连长站在西岸桥头上。大声责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把我们的人挤到河里？”尖兵排的班长冲到桥头后举起冲锋枪一梭子，将敌连长和周围的几个敌人一下子打死，枪声就是命令，我尖刀排一齐行动，有的乘敌不备把敌人推下了河，有的夺过敌人的枪，有的喊缴枪不杀，全连很快就占领了浮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同时向岸边冲去。接着1营主力尾随尖刀连之后，冲过浮桥加入战斗。河西岸山岗上全是露营的敌人，当浮桥的枪声一响，敌如梦初醒，顿时乱作一团，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这时我河东岸全营重火器和团加强迫击炮同时向西岸敌人开火。霎时，枪炮声、喊杀声、马的嘶叫声响成一片，打得敌人蒙头转向，纷纷举手投降。敌人的100多匹骡马，驮着敌军部扣发的3个月的军饷，也成了我们的战利品。被炮弹击的驮马身边，银元撒了一地，连打死的马肚子里也有银元。有一个官太太，见我军冲杀过来，吓得战战兢兢，忙拿出一包金条，哀求饶命。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河两岸之敌4000余人被俘，其余约千余人分两路向西逃跑。我军当即兵分两路，尾随追击。追到中午12点，发现两股敌人又汇合在一起，正在小新街村庄做饭吃，饭还没做好，我主力就赶到了，战斗半个小时，又歼敌一部分，其余敌人弃饭落荒而逃。我军把敌人做好的饭带上，边吃边追。追到天黑敌人刚到一个树林开始做饭，我军猛打猛冲，又歼敌300余名，并缴获骡马50余匹，全是驮的银元。第二天中午，逃敌占领了坪河北的一个小山头，企图顽抗，我军迅速组织部队包围，这时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无心恋战，丢下山头继续逃窜，在离国境边界不远的半坡以东，又被俘虏一部分，其余300余人逃出国境，进入越南老挝交界地区。

整个战斗，452团共歼敌1个军部带1个师，俘敌26军少将高参刘世荣，193师少将副师长邓绍华，尉以上军官300余人，士兵4000余人。敌军部特务营每人各配一支崭新的快慢机卡宾枪，战斗力比较强，也全部俘获，无一漏网。至此，敌26军除极少数逃出国境外，全军覆没。

滇南战役结束后，1连被师党委授予“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

单刀赴会

1950年2月，滇南战役进入尾声。

这时，元江之战已经结束。国民党陆军副司令汤尧、第8兵团副司令兼

第8军军长曹天戈，在几经挣扎之后，无可奈何地当了我军的俘虏。其主力师团基本被歼，残余势力数千人有如漏网之鱼，惊恐万状，狼狈不堪，向滇西南方向逃窜。

那残敌之首，是一个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的“狐狸精”——170师师长孙进贤。元江之战打响之后，此人一看大势已去，气数将尽，便利用我军在元江激战之机，先我追击部队4天越过元江，并不顾其后续部队，炸毁了元江铁索桥，加速向西逃窜。企图逃到中缅边界的车里、沸海、南桥一带，建立一块游击基地，继续与我军周旋。

2月4日，我刘邓大军第13军先头部队在镇元县南京街追上了孙进贤率领的170师。孙进贤估计我军经过长途跋涉，一定疲惫不堪，于是亲自组织了一支“奋勇队”，向我109团5连阵地发起轮番进攻。由于敌众我寡，5连伤亡过半，连长受重伤，指导员率领部队继续奋战。孙进贤知道，我大军在后，不敢恋战，率部沿山径钻进了荒凉的无量山中。

我追击部队相机展开平行追击，一夜强行军180里。2月5日，我109团和100团各1个营（代号为101师、102师），终于绕到了这股溃军的前面，控制了猛统及荒草岭等险要山地。

紧接着，我滇桂黔边区纵队第9支队43团也于2月6日赶到了猛统地区。我先后赶到的两支队伍，堵住了敌人的逃路。当敌170师来到时，我立即给以迎头痛击，将敌压于荒草岭和鸚鵡山下的干铁河谷地带。

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接二连三地组织反扑，均被我军击退。敌人屡战屡败，士气一落再落。2月7日，孙进贤不得不派他的情报科长陈子强，进行我军阵地，要求和平谈判；同时也想借机侦察我军之实力和部署。

当时我军率领先头部队的是37师师长周学义。他当机立断，命令109团副团长周峰带一个警卫员深入敌阵，进行谈判。

周峰单刀赴会，立即成了两军对峙阵地上的一大新闻，到处都在议论，有人预言此去马到成功；有人认为此行凶多吉少……

敌170师师部设在半山腰一个叫干铁街的小村里。谈判原定于下午4时举行，敌方代表为：师长孙进贤、副师长姚良知、李德元，参谋长刘启丸和情报科长陈子强。但是，孙进贤迟迟没有出场。

周峰望着孙进贤的空位，心里在作种种猜测：是敌方对谈判准备不足？是敌方有意拖延时间？还是他们想再动干戈？……等了一会，孙进贤终于出场了。他一来就对周峰招招手，说：“对不起，兄弟晚来了一步。事不由己啊！军务在身，周代表驾到，兄弟表示十二万分的欢迎，我的兄弟也都如此。我和几位团长经过初步磋商，大家对这次谈判，寄予了很大希望。”

周峰见他脸上堆满了一团团肉，一双小眼陷在低凹的肉窝里，流露出不安的神色，说明他对战局并不乐观。但却摆出一付不慌不忙的架势，又在开场白里强调“初步磋商”这说明他给自己准备了一条谈判桌上的退路。

孙进贤说完后，周峰不忙开口，想再听其他敌方代表的口气，但其他人一致要让周峰先讲：“咱们开门见山，请讲条件吧！”

周峰态度庄严，正气凛然，出语不凡，一句话就点到了敌人在谈判桌上必然提出的问题。孙进贤也只好跟着讲开了：

“条件有三。”

“请讲。”

“第一条，弟兄们的意见，到建水去交械，因为……”

周峰先声夺人，故意把他的话打断：“这一条办不到！我们军长有令，要你们赶快觉悟，就地缴械，站到人民方面来，不要一误再误。”

孙进贤勉强笑了笑，然后腔调低沉地说：“周代表有所不知，弟兄们对这里的山民有顾虑啊！如今我们刀枪在手，他们尚且不驯；若是手无寸铁，那是不堪设想的！”

“这个由我们担保！”

“恐怕你们担保不了！”有个敌副师长插话。

“我说可以担保。道理说穿了也简单，你们来的时候，老百姓不但不以礼相待，反而和你们刀枪相向，原因只有一条，就是你们沿途烧杀抢掠，与老百姓为敌；如今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停止罪恶活动，老百姓定会宽恕你们的。”

“只要贵军能提出担保，我们自然是放弃第一个条件的。”

“那么就讲第二个条件吧！”

“第二条，不能把我们的军官和家属分开，要允许骑牲口，还要保证官兵的安全，财产不受侵犯。”

“这一条好说，我们人民军队对俘虏的宽大政策，那是举世闻名的嘛！前几天，你们的军长曹天戈，还有副司令汤尧在元江战场上被俘以后，我们不但不杀，不虐待，不侮辱人格，不搜腰包，而且生活待遇还略有照顾，当天就让他们吃上了牛肉炒花菜。何况我们是和平解决。”在场的人听了都喜形于色，连连点头。周峰接着说：“至于骑牲口的问题，我们当尽力满足。现在请讲第三条吧！”

“弟兄们都同意和平解决问题，但是都说得有个名义。”孙进贤故弄玄虚，到此打住。

“要什么名义？”

“要算起义，不能叫投降。”

周峰冷冷一笑，说：“事到这个地步，怎么能叫起义？要是你们这样也算起义，那么卢汉将军的起义又该怎样叫？”

“要算起义！这一条我们一定要坚持！”敌一个副师长大吼一声。

“否则，我们宁愿战斗到一兵一卒！”另一个副师长也开腔了。

“要知道，你们共军目前在这里的兵力并不算多，而且连火炮和重机枪都没有带来。而我们国军至少还有一师精兵，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如果继续打下去，对贵军也未必有利吧？”狡猾的敌参谋长也开始插话，妄图压服周峰。

面对敌人的暴跳和讹诈，周峰冷静沉着，不急不恼。他时而看着孙进贤，时而微微一笑，但心里却在暗想对策。他认为，目前既要压下敌人的嚣张气焰，使他们放弃幻想；又不能激怒这帮凶顽之徒，要叫他们保存一线希望。因此，既要据理驳斥，又要耐心说服。于是，他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一字一板地讲了一番话：

“在座的都是明白人，在这次滇南战役之初，你们好像有5万多人；再说远一点，在这次内战之初，你们的人马更多，大约有五六百万人，而且还有美式装备、美国顾问。可是现在呢？你们还有多少人呢？你们最清楚。历史是一面明镜，是可以叫人醒悟的。希望大家都想一想历史教训。”

“我们不谈历史，我们只谈现实。”

“谈现实就谈现实！现在全中国都解放了，蒋介石只剩下几个孤岛，眼

看不久也将采取各种形式解放。茫茫大地，只有你们这个师钻到人烟稀少的无量山中，缺食少衣，士无斗志，辗转逃窜，疲于奔命。我们刘邓大军已云集四周，你们想逃脱绝无可能。纵然有些残兵败将逃到缅甸，流亡外国，又有什么出路？”

说到这里，周峰抽了口香烟，环视了一下敌方谈判代表，继续说道：“我们之所以同意谈判，一来是我们刘邓首长战前给你们写过忠告书，希望你们弃暗投明；二来是想停止战斗，减少双方不必要的伤亡，使这里人民早日过上和平日子；再者是想到你们有那么多军中家属，他们没有直接参加内战。他们都是无辜的。何况你们还有些妻子儿女丢在昆明、开远和蒙自，又怎能把她们带走？要是继续打下去，想必落个妻离子散的下场！”

此时此刻，敌方谈判代表面面相觑，然后一齐注视着孙进贤。孙进贤结结巴巴地说：“这好说，这好说。鄙人现在诚心响应刘邓两将军的号召，愿意站到人民方面，只是还需和部属们商量商量。”孙进贤终于吐出这几句话。紧张的气氛，总算得到了缓和。

僵局既已打破，现在就要给敌人一个下台的阶梯。周峰坐下来，又慢慢地说：“这样吧，既不叫起义，也不叫投降，我们举个中间的，叫投诚怎么样！”

孙进贤点点头。显然，他是表示同意投诚了。但是，那两个副师长急忙站起来，还想讨价还价。周峰手一摆，说：“且慢！这不过是我本人的想法，要最后定夺，还得请示我们的军首长！”其实，“投诚”是早已决定的原则，周峰之所以强调请示，不过是给敌人一个统一思想的回旋余地。

“周代表请先回，容弟兄们再商量商量，明天给贵军回话，怎么样？”孙进贤勉强笑着说。

“行！一言为定，明天回话，过时不候。”

“好，送周代表。”

但周峰还想给孙进贤留下一句话，他握着孙进贤的手意味深长地说：“现在，保障你们军官家属安全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你手里了！”

周峰带着警卫员郑小保，挺着胸脯，迈开大步，走出干铁街，沉着镇静地穿过敌军阵地。忽然有个敌军官气势汹汹地追了上来，手中提着加拿大手枪（后来查明此人是个炮兵连长），大声喊道：“姓周的，你给我站住，我们绝不交枪！”很明显，他企图挑衅，并可能杀害周峰。周峰立即拔出手枪，转过身来。郑小保也机警地举起了卡宾枪站在周峰前面。

敌我双方怒目相对片刻，那个敌军官毕竟心虚，只是骂骂咧咧，未敢轻举妄动，最后，他怪叫一声，悻悻地折头而去。

子夜时分，周峰终于安全回到我军阵地。周学义师长听罢周峰汇报，立即命令部队重新调整部署，加固工事，加强警戒，准备在敌人拒不交械时，发起攻击。

敌人会不会投诚？部队一直等到第二天下午，那个情报科长陈子强终于回来了，“我们师长已经同意，就地交械，投诚、投诚！”

2月8日上午，敌170师按照周学义师长的命令，将枪支、弹药分别集中，依次摆在干铁街旁的山坡上。孙进贤率领着2400名官兵，排成三路纵队，在我指战员的引导下，无精打彩地走下了山岗。

敌170师交械投诚后，看到我军阵地上的部队不多，孙进贤对他们以多败少表示懊悔了。他对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军官说，早知共军就这几百人，

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但是，他们哪里懂得，这便是人民战争的规律，也是国民党军失败的规律。

109 团副团长周峰深入敌营，遵照刘邓首长忠告滇南残敌书的精神，舌战群顽，迫敌 2400 人投诚，加速了滇南战役进程的故事，被传为佳话。在滇南战役的庆功大会上，13 军党委为表彰他英勇机智，歼敌有功，特授予他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庄南山，枪起匪灭

1950 年 1 月下旬，川西各地不断发生拦路抢劫、奸淫妇女、行凶杀人、造谣惑众等事件。

2 月 5 日，我 178 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同志率 1 个班去成都开会，路经龙潭寺，被该镇匪特全部杀害。当晚，匪徒又勾结石板滩、龙王镇、新店子等地反动分子，威胁部分群众参加，围攻起义部队驻地石板滩，里应外合，“劫走”起义部队 2000 余人，杀害我工作人员 26 名。

2 月 21 日，匪特开始大规模叛乱，蔓延川西 16 个县，杀害我军政干部，抢劫仓库，破坏公路、桥梁，切断电线，并先后围攻我新繁、崇宁、灌县、郫县、温江、崇庆、大邑、名山、双流、彭山等 10 余座县城，直逼成都。使成渝、成灌、成眉、成新等公路交通被阻断，城乡物资交流受到严重影响，川西地区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为了肃清匪特，净化全区，建立起人民政权，根据川西地区条件和匪特活动特点，西南军区先后两次发出剿匪指示，指出了剿匪意义，要求川西各级党政军组织“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军事打击、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三者结合”。采取“先腹心区、后边沿区；先交通要道，后两侧乡村；先股匪，后散匪”的步骤实施。

剿匪与正规战不一样，正规战斗目标明确。而匪特分散，隐蔽于群众之间，好人坏人难辨认，攻击的目标分不清。加上匪特地形熟悉，情报来得快，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逃之夭夭。川西又是多民族地区，在这里居住的有藏、羌、彝、回、汉等民族，由于匪特帮会的反动宣传和利诱，他们不了解我党的民族政策，害怕我军。

为了揭穿敌人的阴谋，争取群众，打击匪特，我军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川西大山区的 2 月，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但没有一个战士进民房，全部露营在街头村口。每到一地，就帮助群众劈柴、担水、扫地，大做好事。

由于我军执行纪律严明，党的政策深入人心，感动得藏、彝同胞奔走相告，称我军是“菩萨军”。不少群众，甚至进步土司，都主动把解放军让到自己屋里住，军民关系不断接近。

在此基础上，我侦察分队分别化装成农民、商人等，穿长袍、戴礼帽，三五人一组，分散到群众之间，利用群众关系，侦察匪情，捕捉“舌头”，获取情报。

我 537 团侦察排长任敬安，就是在剿匪中涌现出的侦察能手。他身材不高，圆脸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机智灵活、沉着干练的指挥员。

一次，他带着侦察小组化装成商人，到郫县唐章镇侦察。在茶馆里偶然

听见有两个群众小声议论着什么。任排长凑上去操着四川口音和他们拉起了“家常”。

从这两个群众的闲谈中得知，有一小股匪特常来这个小镇子要粮要钱，动不动就打人，搅得村子鸡犬不宁。他们又进村子找群众了解，证实了这一情况。任排长灵机一动，决定打他个埋伏，消灭这股匪徒。

唐章镇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镇，座落在半山腰上，镇后是茂密的树林，镇前有一条小河流过，只有一座木桥可达该镇。任敬安根据地形把侦察排在镇周围撒开，布下了口袋，并规定了攻击信号。

一切准备完毕，战士们都瞪大眼睛，等候匪徒的到来。但出乎预料，从下午3点等到第二天明也未见土匪的影子。有个战士沉不住气了，问任敬安：“排长，是不是走漏了风声土匪不敢来了？”

具有多年侦察经验的任排长和骨干们进行分析，觉得情报还是可靠的。要抓住土匪，就必须有耐心。

果然，第二天下午4时，10来个土匪，身穿便衣，挂着短枪、冲锋枪，大摇大摆地朝镇子里走来。待他们跨过小桥，进入我侦察排的“口袋”，任排长发出了攻击的信号。

顿时，冲锋枪、手榴弹一起开火，当场打死3个匪徒。任排长在我火力掩护下，带领8班冲进院内，把土匪逼到了楼上。楼梯比较窄，敌人在楼上居高临下，不好接近，人一露头，“啪”的就是一枪，八班几次都未冲上去，还伤了1名同志。副班长李秀林来了火，牙咬得咯咯响，他把棉衣一脱，打开手榴弹盖，把冒着烟的手榴弹从楼梯口甩了上去，乘着爆炸的烟雾冲上楼，与敌人展开了搏斗，生擒了1个匪徒。另1个土匪见我侦察兵冲上了楼，吓得钻进夹墙暗房，也被我战士活捉。

唐章镇剿匪，首战告捷，击毙8名匪徒，活捉两名。

经审讯，两名俘虏交代：他们是胡宗南的残余部队，在一名营长的操纵下，勾结地方反动势力300多人，在庄南山一带占山为寇，经常派便衣进村抢夺群众财物，袭击我工作人员和运粮队。

团立即命令1营去庄南山歼灭这股残兵游勇。1营在营长李佐军的率领下，乘夜幕笼罩，冒着严寒，长途奔袭20余里，到达庄南山，占领有利地形，对该敌实施包围。

庄南山的敌人作梦也没想到解放军会这个时候袭击他们。在土匪的住处，有的匪徒在猜拳喝酒，有的在瓜分抢夺的财物，匪营长哼着下流曲子和几个匪军官打牌赌博，整个山庄被他们闹腾得乌烟瘴气。

敌人正玩得起劲的时候，我军的机枪响了，步枪、手榴弹从四面八方向匪巢打来。匪营长一听枪声很紧，知道情况不妙，赶紧吹灭了灯，带着部分匪徒就往山后跑，企图钻进密林逃跑，被我2连一阵猛打，就掉头往左边突，又遭到我3连迎头痛击。

匪营长这时才知道被我军包围了。他集中约1个连的兵力向村口冲击，我1连连长曹润海指挥部队以火力把这股匪徒压了回去。敌营长也受了伤，一时失去了指挥，像没了头的苍蝇，乱作一团。

营教导员李凤歧立即组织对敌喊话：

“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我军宽待俘虏”。

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之下，敌人全部缴械投降。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40多人，俘敌营长以下300多人。

“游击之母”落网

女匪首赵洪文国，原是东北一个地区的反共组织头目，双手都能打枪，绰号“双枪太婆”。其丈夫是一个军阀。赵洪文国其人极为反动，曾因反共有“功”，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还一起照相留影。蒋介石称她为“游击之母”，对她寄予很大希望。东北解放后，赵匪无处藏身，潜逃到西南，打起“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勾结国民党残匪，招兵买枪，网罗地痞流氓等社会渣子，欺骗蒙蔽部分无知的青年学生，约4000多人，在松潘、理县、什仿、绵竹一带活动，烧杀抢掠，鱼肉百姓，搞得民不聊生，民愤极大。

1950年4月中旬，川西军区电示：女匪首赵洪文国带着2000多名残匪窜到绵竹县境内的大石坝一带山区，令537团1营以强行军速度追歼赵匪。

经过200多里的强行军，我1营抵达大石坝。赵匪已先我军两天由大石坝逃往彭县的高桥镇。大石坝一带山区原是我红军根据地，群众条件很好，纷纷要求给我军带路走近道追击残匪。但走近路还要翻越两座山，穿越密林，大部队不易行动。当夜，召开了连以上会议，决定大部队由教导员李凤歧和曹润海带领走大路向高桥前进，并联络起义部队；由营长李佐军带3连、2连两个排，重机枪和一门迫击炮，由人扛着抄小路追击。

李营长率部第二天拂晓出发，爬山涉水，行程100多里，黄昏时追至绵竹县距红庙场、白庙场七、八里地的一个小山庄，就听到红、白庙场方向有激烈的枪声。李营长随即把部队隐蔽于小山庄内，封锁消息，一面做饭吃，一面找群众了解匪情和地形。

群众知道我军是当年的红军时，都非常高兴和热情，当场就有两位老乡说他们是红军留下来的伤病员，要求给部队带路。他们告诉李营长：

“匪司令部就住在红庙场村南头的一座大庙里”。

去红庙场要通过村北的竹索桥，别无它路可走。李佐军立即派3连长刘志全带两个排长和几名战士，由老乡带路去实地侦察，见竹索桥无敌防守。他们经分析认为：匪徒可能集中全力与高桥兄弟部队作战，对后面没有任何防备，于是，决定迅速采取夜间突然袭击、“老虎掏心”的战术，攻击敌司令部，一举将赵匪歼灭。

当夜12时发起攻击，3连为突击队，由连长刘志全带两个班静肃摸过竹索桥，沿街猛打猛冲，直捣匪司令部；2连一个排作为营预备队；另一个排由连长董明义带领沿村西侧配合3连消灭匪司令部的敌人。重机枪、迫击炮占领竹索桥北小山包有利地形，随时支援3连突击。

按预订方案，3连两个尖刀班通过竹索桥，接近村口。这时，匪兵发觉。战斗一打响，3连和2连1个排猛扑匪司令部。3连不愧为英雄连队，尽管长途跋涉，非常疲劳，但在连长的带领下，犹如虎入羊群。他们搭人梯翻过1丈多高的院墙，与敌展开了近战夜战，打得匪特哭爹叫娘，抱头鼠窜，有的胡乱开枪，有的躲在供桌下发抖……。这伙匪徒都是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仅十几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歼匪100多人。

女匪首赵洪文国，见大势一去，丢弃她的“滑杆”（轿子），装扮成村妇，带着几名亲信，乘混乱之机逃走，潜入群众家里，威胁群众不得声张，企图蒙混过关，保全狗命。

但不论她怎样乔装打扮，玩弄什么花招，也休想逃脱我军民布下的天罗

地网。在我战士的严密搜查和群众的揭发下，这个赫赫有名的“游击之母”、“反共救国军”司令成了我军的俘虏。

战斗持续到第二天凌晨，红、白庙场的东西山头有几百名匪徒向我军围来，妄图劫走其主子赵洪文国。我1营部队迅速占领制高点。3连和重机枪、迫击炮向红庙场西山攻击，并占领了西山，与敌对峙。匪特集中两个连的兵力向3连扑来。

面对多于自己一倍之敌的3连勇士们，毫不畏惧。他们以一挡十，展开了激战。战斗中，连长刘志全同志英勇牺牲，部队也有伤亡。

在这紧急关头，教导员李凤歧带领大部队从高桥方向赶来，国民党20兵团的部分起义部队也前来支援，对敌前后夹击。在友邻部队的密切配合下，1营大胆穿插、分割，穷追猛打，经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先后歼灭了红庙场西山和白庙场东山之敌，歼灭敌1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俘虏200余人，还活捉了赵匪的两个儿子。

围绕解放海南岛之争

1949年12月，广西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决定以10万兵力集结雷州半岛，准备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又名琼崖，北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面积3.2万余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000公里，琼州海峡宽约20至50公里，是我国南部的海上屏障。逃亡到海南岛的国民党残余守敌为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部5个军19个师以及海军第3舰队和空军4个大队约10万人，企图以所谓“立体防御”凭险固守，把海南岛当作反攻大陆的跳板，同时，也作了在情况不利时实行“主动撤离”的准备。

这时，一个何时解放海南岛，如何解放海南岛的问题，即围绕“早打还是晚打”、“用木帆船还是购买登陆艇进行渡海作战”等问题，在当时担任4野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韩先楚和4野司令员林彪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发生了尖锐的争论。

在时间问题上，林彪的主张是晚打。他在1950年1月23日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就说：“渡海作战的准备还需五六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至于使用什么渡海工具实施渡海作战问题上，林彪主张到港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器船。与此相反，韩先楚则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关于早日解放海南岛的意图，在反复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力主使用木船早打，并精辟地分析了晚打和等待购买登陆艇渡海作战的种种弊端。明确指出：“去香港买登陆艇，我看这办法行不通！帝国主义怎么会卖登陆艇给我们去打蒋介石呢？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是我们的光荣传统，我们就是要用木船去解放海南岛。”

为了加强海南岛我军的接应力量和积累我军木船渡海作战的经验，韩先楚所在的40军以及43军于3月5日至3月31日，先后组织了2个团又3个营偷渡登陆成功。在偷渡登陆中摸到的木船渡海作战的经验和岛上接应力量的增强，使韩先楚更加坚定了依靠木船渡海，早日解放海南岛的信心。他置林彪不断电令部队继续组织小型偷渡的举措于不顾，力主抓住我军南渡海峡最为有利的季风战机，组织大规模登陆，迅速发起解放海南岛战役。经反复权衡，深思熟虑之后毅然给兵团、4野发了一份长电，并转报中央军委和

毛泽东主席，将迅速实施大规模渡海作战与继续进行小型偷渡的利弊，作了透彻的阐述，鲜明地提出了进行大规模渡海作战的建议。很快，毛泽东主席肯定了韩先楚的建议，在电报中明确指示：“必须一次运载足够兵力和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依靠后援。”

按照这一指示，1950年4月16日，我人民解放军在无任何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发起了大规模的渡海作战，一举冲破国民党海陆空军的重重阻拦，在琼崖纵队和预先登陆部队的接应下，胜利登陆，把五星红旗插上了海南岛。

木船对兵舰，跨海取琼崖

1949年12月，邓华作为15兵团司令员，奉命统一指挥40军、43军，在海南琼崖纵队的配合下，准备渡过琼州海峡，适时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守敌10万余人，在国民党防卫司令薛岳指挥下，组织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守敌虽系残兵败将、士气低落，但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则是一个全新课题。解放军参战部队从指挥员到战斗员，都没有渡海作战经验，而且指战员大部分是北方籍，不识水性，许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大海；同时，参战部队一没有机械化渡海工具，二没有海、空军配合作战。关于作战指导思想，邓华反复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坚决如期完成解放海南岛的任务，但又必须慎重从事，既要英勇果敢，又要稳打稳扎。1950年2月初，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兵团经过反复研究，并听取琼崖纵队同志意见后，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主力强渡相结合”的渡海作战方针。

木帆船能否同敌舰作战，能否把大军渡过海峡，这是当时许多人疑虑的一个问题。在开展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时，43军的1个副排长鲁湘云带领8个战士，乘小帆船与蒋军兵舰遭遇，他们在离敌五六十米距离时，一齐开火，打得敌舰狼狈逃窜。40军119师在涠洲岛登陆时，土炮艇（用十轮卡马达装配的机器船，上装战防炮等火炮）勇敢上前与敌舰炮战，击伤其“海硕”，敌舰迅速逃走。邓华在给各参战部队电报中指出：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能够勇敢逼近敌舰，敌人是不敢恋战的。”“必须教育全体指战员，坚决向敌舰展开斗争，只有勇敢地向敌舰进击，才能将敌舰威风打下去，才能缩小敌舰活动范围，争取我在海上的行动自由。”紧接着，在3月份，前后两批4次营团规模偷渡成功。至此，广大指战员取得了渡海作战的经验，坚定了用木船战胜敌舰、胜利跨越天险的勇气与信心，为主力大规模强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掌握了风向、潮流等气象规律后，兵团不失时机地确定4月16日部队大规模强渡。这天19时30分40军和43军共8个团2.5万余人，作为强渡的第1梯队，分乘木帆船318只、机帆船32只，于雷州半岛南端起航，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指海南。途中与敌舰发生激战，蒋军旗舰“太平”号司令塔被解放军土炮艇击中起火，舰队司令王恩华负重伤，回去后不久即身亡。解放军船队突破海上封锁，奋勇前进，于17日凌晨3至6时先后在海南岛登陆，与前来接应的先期偷渡登陆部队和琼崖纵队胜利会师。连同琼崖纵队2万余人，我在岛上兵力已达到5.3万余人。

解放军登陆后，邓华立即乘胜组织并指挥了美亭决战，粉碎薛岳围歼登陆部队计划，歼其主力一部，蒋军随之全线崩溃。24日凌晨，解放军渡海第

2 梯队 5 个团顺利登陆。登陆大军分路向南猛追，于 5 月 1 日解放全岛。整个战役歼敌 3.3 万余人，击毁敌机 2 架，击伤敌舰 5 艘、击沉敌舰 1 艘。

邓华负责指挥的解放海南岛战役，被誉为“开创了我军胜利渡海作战的先例，创造了落后的木船战胜现代兵舰的奇迹，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赋予的光荣作战任务。”

匪洞攻坚

1950 年初，贵州起义的一些国民党部队开始叛乱，西南军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首长指示，要 15 军抽派部队入黔协同兄弟部队剿匪。

4 月 10 日，45 师崔师长带着指挥所的少数警卫人员，分乘一辆小车，一辆中吉普车，一辆大卡车开向军部所在地毕节接受任务。不料没走远，大卡车从山上摔到几丈深的沟里，车上的 30 多名战士都被甩出去很远。崔师长用望远镜一看，周围山头黑压压的尽是土匪，情况非常紧急。崔师长命令，由王副政委负责抢救伤员；唐副师长组织剩余的警卫人员占领有利地形，负责保卫；他自己拿起一支长弹夹的卡宾枪，带了一个警卫员坐上中吉普，要司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准停车，坚决冲出去，赶到军部报告。司机加大油门，飞速前进，摆脱了土匪，到了毕节。向军领导报告后，军部立即派出部队和救护车赶往现场，才把师指挥所援救出来，但已有 13 名战士牺牲、20 多名负伤。

4 月 13 日，军首长宣布了西南军区的命令：命 45 师除 133 团随军部继续北上入川外，师部及 134 团、135 团留毕节消灭起义又叛变的国民党保安 271 师，增援被土匪包围在纳雍、水城之间的兄弟部队。

驻在纳雍、织金、水城三县的国民党 271 师所属的 3 个团，于 4 月 4 日叛变，杀害了我军派驻该部的军事代表，并将我 47 师 141 团团直属队及 1 营包围在水城与纳雍之间。接着，原国民党毕节专署保安司令、独立师师长罗湘培来到纳雍，纠集纳雍、郎岱、水城、织金、普定等地匪首，成立了“反共救国军第八兵团”，罗湘培任兵团司令，原来的几个保安团一下扩充为 3 个军。匪首们都一个个当上了军长、师长，明目张胆地在其所盘踞的地域内张贴布告，气焰非常嚣张。另外，在纳雍、织金、水城三县的人民政府和驻军遵照贵州省委指示暂时撤出后，当地恶霸地主也纷纷建立了土匪乡保武装。织金县恶霸地主李名山担任了黔西北八县游击总指挥，郎岱大土司、国民党国大代表安克庚任参谋长，并成立了游击总指挥部。这样一来，在纳、水整个地区，便形成了以罗湘培、李名山为首的两大股土匪武装，盘踞了三个县的城镇和乡村。

据侦察得知，在纳雍城内聚集有 1200 多匪徒，是叛匪 271 师的中心。4 月 11 日，135 团从大方羊场向纳雍开进，经 3 天急行军，14 日抵北街，部队分两路合击县城。15 日突入城内，歼敌保 6 团全部和保 1 团、保 5 团各一部，俘保 6 团副团长唐建辉以下 600 人，使这股猖狂一时的土匪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残敌向东南方向的织金与白泥屯溃逃。与此同时，我 134 团于 4 月 16 日奔袭水城。土匪闻风逃窜，我军顺利收复了水城县城。

纳雍、水城收复以后，为不给叛匪以喘息之机，各路部队跟踪追击，力求全歼。谁知当我军跟踪追击逃匪时，匪首带着匪徒们钻进了大山中的山洞里，踞险顽抗。这一带绵延数百里的丛山峻岭中，不知有多少大大小小的石

灰岩溶洞，形象千奇百怪，有的像雄师张开的血盆大口，洞深难测；有的座落在半山腰，一个个小洞排列有序，就像高大建筑物的门窗，里面洞中有洞，洞洞相通，成了叛匪顽抗的坚固堡垒，也成了我们消灭叛匪的极大障碍。为此，破洞攻坚，就成了我们在剿匪中的一种特殊战斗形式。

4月22日，134团奔袭水城后，匪271师参谋长刘剑峰、1纵队司令杨正斌和保5团团团长兼水城伪县长何明芳带着匪徒200多人，钻入蚌井的两个山洞中。这两个洞都在半山腰上，离地10丈多高。土匪们事先在洞外修筑了外墙，在洞内储存了大批粮食。匪首向匪徒们许诺，守一天洞，发5块大洋，决心与我顽抗到底。134团3营的战士们把这两个山洞封锁后，与土匪展开了冷枪战，只要土匪一露头就开枪。部队经过反复查看地形，发扬军事民主，决定用火攻。王学智班的战士们拾柴禾、背石灰，又买来了几十斤辣子舂成细末，和石灰装在竹篮子里，篮子里又装上炸药，套上手榴弹。战士们翻上岩顶，将篮子吊到洞口。匪徒们以为有人给他们送吃的来了，都急着来抢。岩上的战士把绳子一拉，手榴弹爆炸了。石灰、辣子面四处飞扬，前来争抢篮子的20多名土匪不死即伤，其余的被石灰、辣子呛得直往洞里钻。这样经过20多次爆破，洞口的外墙被炸掉了不少，外墙下的一口水井也被破坏了。土匪在洞内两天没有水煮饭吃，特别是那些被炸死的匪徒尸体没地方放，只好埋在粮食堆里，臭气难闻。炸伤的匪徒满洞呻吟嚎叫，土匪士气大减。经过3天围困，部队于4月25日拂晓发起攻击。3营10连由正面进攻，冲了4次，没有奏效。11连由侧面隐蔽接近外墙。战士路金龙首先冲上去施行爆破。他冒着弹雨在墙下安好炸药，占燃导火绳，隐蔽起来。但等了一分钟还不见爆炸，他又第二次去进行爆破，不料在这一瞬间炸药起爆了，敌人外墙全部被摧毁，可路金龙同志却光荣牺牲了。守卫在外墙上的敌人1个排全部毙伤。战士们趁机冲入洞内。指挥匪徒抵抗的1纵队司令杨正斌和水城伪县长何明芳见洞打开，便丢下匪徒跳岩潜逃，被我在洞下包围的部队活捉。在洞中的叛匪271师参谋长刘剑峰及全部匪兵也都束手就擒。

4月24日，135团追歼叛匪，抵达郎岱县境时，了解到郎岱县大土司、国民党国大代表，匪八县游击总参谋长安克庚带着150余名匪徒钻进了郎岱与织金交界的窗子洞里。这个洞位于绝壁之上，离地20余米，离壁顶数10米。当地群众反映，这个洞在以前军阀混战时期，国民党曾用了9个县的民团打了3个月都没有打开。不久前，安克庚搬了大批粮食、煤炭和枪弹藏入洞内，洞内有一股地下水可供食用。安克庚以为有此天险，粮弹又充足，便可与我长期对抗了。

135团包围了窗子洞，吸收了134团打蚌井洞的经验，由团政委李尚文直接指挥，从洞顶吊炸药至洞口，摧毁石墙，又用石灰、辣子等刺激物封锁洞口，连续围攻了3天。5月2日黄昏时分，我2营7连、3营11连的战士们用事先捆扎好的长梯子，在火力掩护下从山下搭上洞口，4班副班长方义斌首先爬了上去。不料土匪从洞口推出大量巨石，砸断了梯子，还砸伤了洞下的70多名战士。第一次进攻受挫。接着，2营7连机枪手张科勇敢地抱着机枪，用绳子拴在腰间，悬空而下，停在洞口上方，以猛烈火力封锁洞口，掩护11连从侧面突入洞口。副班长高建凡首先冲开封洞的大门，一举突入洞内，将安克庚及130余名匪徒全部活捉，缴获轻重机枪7挺，长短枪50余支，弹药500箱，鸦片烟数千斤，猪肉1000余斤。

在135团攻打窗子洞的同时，我军又将织金境内的四方洞包围了起来。

这里为八县游击总指挥，织金县恶霸地主李名山和国民党总统府军事特派员桂运昌所盘踞。我军把竹竿横架在洞口上方的小树上，一个劲地往里面扔手榴弹，炸得敌人不敢抬头。然后又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利用在窗子洞俘虏的李名山的儿媳妇喊话，又动员俘虏的 271 师参谋长刘剑峰写信劝降。李名山和桂运昌在里面被围了 7 天，走投无路，只好带着洞内的 64 名匪徒投降。

蚌井洞、窗子洞、四方洞连续被打开，一个个匪首相继落网，我军声威大震。5 月 18 日，135 团乘胜第二次解放织金县城，将盘踞在织金的“黔西游击队”参谋长田振武俘获。这样，在毕节地区我军暂放弃的纳雍、织金、水城已全部收复。135 团解放织金后，成立了县人民政府，团政委李尚文兼任了县委书记。5 月下旬，织金县城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长期被李名山欺压的大批苗族群众，从几十里地外赶来参加，亲眼看到了人民政府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李名山、田振武。广大群众群情激奋，欢欣鼓舞，异口同声说道：“毙了李名山，人民见青天，杀了田振武，人民享幸福”。

李家寨头血飞花

1950 年 8 月 16 日，贵州匪首卢杰、漆文彬、蔡维新等人拼凑“遵、仁、桐、赤、金联合办事处”及“反共总指挥部”，试图把赵翔龙、晏子高、周一、黄文英等股匪纠合在一起，对抗我军的围剿。

我 139 团团团长徐仲禹得知上述情况，决定乘胜出击。

乌合而来的股匪，见我军以泰山压顶之势进剿，又化整为零，云散而去。

我 139 团 5 连和 8 连，根据剿匪作战方案，直插桑木、二郎坝等地，寻敌作战。他们得知大部分土匪已向兴隆场方向逃窜。

位于大山半腰的兴隆场，一片漆黑，静寂无声。5 连组织搜索组，钻进兴隆场搜索。

在兴隆场边的一个破草屋里，10 来个散匪正睡大觉，1 个土匪起来小便，猛然发现我军已到兴隆场上，惊呼了一声：

“快跑，解放军追上来了！”

喊声惊醒了这伙土匪，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这么快就到了这里，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没命地往兴隆场后面的大山顶上逃窜。

搜索组的战士们听见土匪喊叫，迅速向场边冲击。天黑雾浓，看不真切，只隐隐约约发现人影晃动，战士们即追赶围歼。山高坡陡，越往上，地形越险要，战士们仍穷追不舍。但被敌人的火力阻住。

天亮雾散，一了解，才知道昨夜被我军包围的大山顶上，有 1 个土匪巢穴，名叫李家寨。

李家寨位于兴隆场边的山顶上，而兴隆场则在大山的山腰。这里是仁怀、习水、桐梓三县的交界地带，群山耸立，沟深林密，地形复杂险要。

当地恶霸、“反共救国军第 6 纵队司令”李正开，长期以来，利用三县交界的地区特点和山大沟深的地理环境，称霸一方，为所欲为。他网罗了一伙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和乡、保长，四处骚扰，无恶不作。

李正开既狠毒又狡诈，他以地形奇险的李家寨作巢穴，又在寨外修筑起 3 道又高又厚的石墙。与此相配合的碉堡、掩体纵横交错，形成交叉火力网。李家寨最高点能控制四周。盘踞在李家寨的土匪，认为李家寨易守难攻，万无一失，称之为“安全寨”。

“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卢杰，也看中了李家寨这个坚固巢穴，窜到这里，把它作为“司令部”，在这里遥控各地股匪，组织指挥遵、仁、赤、习等地的反共武装，与解放军抗衡。

经侦察得知，寨内有土匪170多人，除匪首卢杰、李正开外，还有匪“18纵队副司令”杜甘棠。这群顽匪，凭借李家寨这个坚固营垒，拼死顽抗。

我军一面休整部队，作好强攻准备，一面开展政治攻势，写信争取土匪投降。

李正开收到我军的劝降信后，贼眼球骨碌碌转了几圈，决定采取缓兵之计。一会推说卢杰不在山上不便回答，一会又要我军先撤走，他才投降。我军接连去了5封信，李正开都采取拖延的态度。他想争取时间，整修工事，固守待援。

狡猾的土匪采取我驻他扰的战术，夜间出来捣乱，枪声持续不断。战士们几天几夜没睡上一个囫囵觉，异常疲倦，眼睛里都布满了通红的血丝，但他们仍然顽强战斗，一次次打退了土匪的袭扰。战士们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纷纷请战。

24日，团部派来了炮兵。干部战士一看到战防炮、六炮、八二炮来助威，乐得心里开了花。

战斗命令下达了。担任突击任务的是5连和8连分别组成的两个突击队，分别从两个方向同时向李家寨突击。

12时，我军的各种火炮首先发言。

顷刻间，隆隆的炮声震撼着群山，炮弹带着尖利的啸叫声飞向李家寨，但见得李家寨上空硝烟弥漫，铁石横飞。

趁着炮火硝烟弥漫之际，8连和5连的两支突击队，从两个不同的方向逐渐接近李家寨外围寨墙。

突然，轰击李家寨的炮弹爆炸声稀落下来。原来是威力大的那门战防炮的炮闩插销断了。土匪们一听炮声像要停息，纷纷钻出掩体，向我军射击。

这时，突击队员们还没有运动到寨墙下，正暴露在土匪居高临下的火力之中，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情况十分危急。

炮兵急中生智，用铁钉代替插销，继续实施炮火轰击。一发发炮弹猛轰匪巢，把刚露出头来顽抗的土匪炸得血肉飞溅。活着的鬼哭狼嚎，慌忙钻进掩体和碉堡里去。

我突击队趁机接近敌人的最外层寨墙，等炮火一停我机枪、步枪一齐扫向敌巢，打在寨墙上，迸发出点点火星。

5连的突击队从李家寨左侧强攻，梯子班已将梯子靠上寨墙。5连3班战士张明喜，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见梯子一架稳，就嗖嗖迅速攀登上去。他刚垮上墙头，正欲举枪横扫墙里的匪徒，就在这时，李正开的兄弟、土匪大队长李正科，推出一根大树桩从寨墙上滚来，张明喜侧身躲避，一下子失去重心，连人带梯子翻下墙来。只见大树桩直朝张明喜头上砸下来，幸好树桩一头着地倒向一边，没有砸着。

张明喜一个鹞子翻身爬起来，抓起一颗手榴弹甩进寨墙内，炸得墙里的土匪嗷嗷乱叫。他乘机又将梯子竖起，连续甩进两颗手榴弹，登上梯子一跃跨上墙顶。

第二名战士陈海宝紧跟着也登上梯子。

张明喜抓住战机，端起冲锋枪向匪群猛扫。李正科正躲在一个角落狂呼

乱叫，督促匪徒顽抗。张明喜举枪就是一个点射，把李正科打翻在地。

这时，陈海宝也跳进寨墙里，还没有站稳脚跟，一个装死的土匪挥起大刀照着他的腿猛砍一刀。陈海宝一下倒在地上，但他忍着剧痛，马上咬牙坐起来，举枪将土匪打死，又朝着仓皇奔逃的匪众扫射。两位勇士巩固了突破口，掩护后面的战友登上了寨墙。

与此同时，8连的突击队从李家寨正面强攻。突击队迅速选择一处被炮火炸塌的地方，竖起梯子，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冲进了第一道寨墙。

土匪们见我军突破了第一道寨墙，顿时像火烧马蜂窝一样乱了营，一边胡乱打枪，一边退缩到第二道寨墙里面，负隅顽抗。

绝不能给土匪喘息之机！

8连突击队又抬起梯子靠上第二道寨墙。墙高梯短，战士们登上梯子顶还够不着墙顶，再加上墙下怪石磷峒，立不住脚。

战士梁敬喜、周天飞、包克强奋不顾身，用肩膀托起梯子，增加了高度。战士夏海清立即登上梯子，爬上墙去。

土匪在里面觉察了，立即用机枪射击。夏海清小腹中弹跌下寨墙。手榴弹也跟着飞过墙来。梁敬喜左腿负伤，突击队又有4人伤亡。

班长韩炳银立即命令还以颜色。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韩班长指挥战士们再次登墙。梁敬喜不顾腿伤，只身扛起梯子。战士们猛扑墙头，冲了进去。

有几个被炸懵的土匪醒过神来，见我军突击队员正翻越寨墙，又开始扫射。正在突破口的张德正、赵忠相继中弹跌下寨墙。冲进去的战士一见土匪反击，气得举枪就是一阵猛扫，只打得土匪东倒西歪，喊爹叫娘。

这时，在第二道寨墙和第三道寨墙之间的土匪地堡，正向外喷吐着一道道火舌，使8连突击队不能靠近最后一道寨墙。正在这时，5连突击队也突入第二道寨墙。两支突击队便夹击地堡，从而分散了土匪的火力。

两处受伤的梁敬喜，紧咬牙关，利用地形地物隐蔽接近敌堡，放好炸药，把敌人的地堡炸上了天。

两支突击队便会合在一起，集中力量猛攻第三道寨墙。

李家寨里的土匪，见我军攻势越来越猛，吓得心惊肉跳，纷纷向寨里逃去。匪首李正开惊恐万状，像只被打急了的疯狗，嚎叫着驱赶匪众顽抗，又被我军打倒了一片。

受了伤的李正开，此时蛮劲儿也没有了，慌忙躲到隐蔽处，然后，寻隙溜到寨后，顺着岩壁石缝滑下山去。

匪司令卢杰，一直认为李家寨堡垒坚固，是个“保命寨”。他不但在这里坐阵指挥，而且还将老婆和5个小孩也接上山寨。那知在我军的猛攻下，李家寨竟垮得这样快。也顾不得家眷子女，拔腿就逃。他的老婆见卢杰独自逃命，哭天喊地，刚一站起身，被一颗流弹击中。卢杰慌忙奔向寨后绝壁。有几个土匪见司令逃跑，也跟随其后，来到了绝壁边缘。

我突击队战士紧撵上去。走投无路的土匪在绝壁上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有几个正栓起绳索往下吊。战士们一阵猛扫，众土匪惨叫着纷纷栽下深涧。

李家寨的枪声渐渐稀落下来，在地堡、掩体里的土匪，都丢下武器举手投降。战士们立即搜索躲藏的散匪。在一个石洞外，战士们见茅草倒伏，便喝令洞内土匪出来投降。只听洞里传出沙哑的哀叫：

“别开枪，我们出来投降。”

话音刚落，只见一个匪头战战兢兢地从洞里钻了出来。这家伙就是匪“18纵队副司令”杜甘棠。他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像筛糠一样，颤抖的双腿不知怎么迈步，一副狼狈相。

在另一个石洞里，战士们又搜出30多个土匪。

根据土匪的供词，李正开潜逃，卢杰坠落悬崖。为了弄清卢杰是否毙命，战士们用绳索吊下悬崖。只见下面摔死了不少土匪。有的肢断脑裂，有的叉死在树上，唯独不见卢杰的尸首。周围树大林密，无法追捕，只好作罢。

李家寨攻坚战除匪首卢杰、李正开逃脱外，毙伤匪50余名，俘匪第18纵队副司令杜甘棠以下70余名，缴获各种枪118支、手榴弹200余枚、电台1部。

巧歼土匪

共和国成立之初，散落在湘西深山密林中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武装，活动十分猖狂。他们晓伏夜出，暗杀干部群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建设，企图配合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把新生的基层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这些小股土匪武装的残暴行径激起广大群众的极大义愤。人民解放军驻湘之12兵团，决心尽快铲除这些土匪武装，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0年9月的一天晚上，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解放军第12兵团政委的黄克诚，从抓获的土匪口中了解到，盘踞在雪峰山区的土匪头子易朗照，打算在重阳节这天将各路匪首请到铁山庙，举行“双庆”大宴，即庆祝他荣升国民党“华南反共救国军”师长和40大寿。但是，由于担心被剿匪的解放军主力部队围歼，所以有些犹豫不决。

“这到是个机会！”黄克诚想：“何不抓住战机将这些土匪头子一网打尽呢？”

就这么办！黄克诚决心已定，立即召集作战会议，进行部署。

9月6日这天，担负湘西剿匪任务的12兵团主力部队，突然整装开拔了。

正在举旗不定的易朗照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手下土匪，下山进一步打探消息。探子回来报告说，解放军主力北上抗美援朝去了。易朗照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马上命令手下筹办“双庆”大宴，并立即通知各路匪首前来铁山庙聚会。

9月9日重阳节到了，铁山庙异常热闹。土匪头子易朗照担心发生意外，就让手下于将布置了多层岗哨，然后才大摇大摆地来到铁山庙。早已赶到铁山庙的各路匪首，抬着礼物，吆三喝四地站在庙堂前，纷纷向易朗照道贺。

宴会开始后，易朗照陪着各路匪首开怀畅饮。早就等得不耐烦的上千名大小土匪，更是放心大胆地大吃大喝，行令猜拳，好不热闹。

入夜，正当这伙土匪酒足饭饱，早已沉醉于梦境之时，突然，铁山庙四周响起激烈的枪炮声，直惊得正在做美梦的易朗照和众匪出了一身冷汗。

“哪里打枪？”易朗照急忙问。

“不知道！”

原来，黄克诚为全歼这帮土匪，设计将主力部队撤出城外，在附近兜了一个大圈子，估计到土匪们放心开宴后，又命令部队悄悄返回，直扑铁山庙。

此时，铁山庙已被人民解放军18个加强连团团包围，并迅速发起凌厉的

攻势。土匪们妄图凭借铁山庙负隅顽抗，但终因土匪们猝不及防，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火力下，很快被歼大部，土匪头子易朗照及其他匪首无一逃匿，均被活捉。

智钓女匪首

1950年8月，我550团进驻会理、宁南、盐边3县，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发动群众剿匪肃特，建立革命政权。

可是，潜伏这里的国民党武装匪特，不甘心失败，勾结封建地主、流氓、散兵，发动武装叛乱。四处抢劫，惨害群众，抓捕我政府工作人员，袭击我外出活动小分队。1950年8月中旬，更向我各地驻军进攻，并扬言：“要攻下会理县城，赶走解放军。”反动气焰非常嚣张。

9月9日，9连一部在会理城东南铁匠村掩护运粮，路上遭匪伏击。15日8时匪首王姚氏、龙成、芦华庆、夏志科等率部300余人分两路包围我驻姜舟村部队，扬言要“消灭姜舟解放军”，破坏交通，封锁消息，割断通会理城的电话线，妄图切断我小分队同会理的联系，最后夺取姜舟。

9连8班、小炮班和金江支队4中队共百余人，在9连政指张兴林、支队长胥印候带领下，在姜舟附近开展地方工作，他们得知王、龙匪部准备围攻姜舟的消息后，拟好战斗方案，加修工事、火力点，积极作好战斗准备，决心以少胜多，争取时间，协同主力全歼该匪。

15日，匪特开始围攻姜舟，团党委决定：“抓紧战机，集中兵力，痛歼该敌。”一面命令张兴林、胥印候固守待援；一面秘密抽调部队，集中主要兵力，隐蔽插到敌后，以便四面包围，内外夹攻，全歼敌人。

当9连到村外占领阵地时，匪特即涌入村内，大喊大叫：

“解放军败了！”

接着，敌人就猖狂地向黑神庙、观音庙、村东山碉堡攻击而来。立即被我军迎头痛击，消灭了跑在最前面的9个敌人，其余抱头窜回村内。然后，他们时而向我阵地猛攻，时而用冷枪冷炮袭扰封锁我人员进出道路，还公然喊话“劝降”，叫嚣要“打死张兴林，活捉胥印候”。敌人估计我姜舟守军少，会理兵力分散，不会抽调部队增援，妄图在长期围困中，消耗、削弱我防御力量，从而攻占姜舟。

但是，守在阵地的9连勇士们，打得英勇，守得顽强，上下团结一心，一直坚守了6天5夜，而且越战越强，士气越来越高。

16日，团在会理城集中9连两个排、1连两个排、3营机枪连1个排，组成了一支精干的突击部队，由3营营长王来保同志指挥，于17日晚出发，利用夜暗，长途奔袭，连续3夜冒雨行军，于19日夜迂回到敌人后方姜舟村东南的铁匠村。将留守在该村之匪全部捕捉，并解救出5名被敌人抓去的我政府工作人员。当天深夜，插至姜舟村南山敌人背后隐蔽起来。

为迷惑敌人，掩护突击队的行动，团又组织了一支佯攻部队：1连副连长带1连1个排和金江支队5中队，于19日早饭后，由城内出发，沿着大路大摇大摆的向姜舟佯动，一面掩护修复通往姜舟的电话线，一面打枪打炮，摆出拚命增援的架势，但却攻而不进，把敌人吸引到佯攻的方向。

1连的佯攻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从会理到姜舟不到1天的路程，他们对敌人边打边进，有时追过去，又撤回来，纠缠了1天多，等到预定时间—

—20日上午9时，准时前进到姜舟村北，与敌人“激战”起来。这时，他们已架通电话，同坚守部队取得联系，部队在村北展开，但等主攻部队准备就绪，便同时发起冲击。

像咬住了有味的钓饵的敌人总指挥、女匪首王姚氏，一直认为我增援部队的主力在村北，她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通往会理方向，主要兵力也放在村北，与担任佯攻的1连激战不息。

9月20日上午10时，敌主力还在拚命阻击我佯攻部队，这时，三颗红色的信号弹，在姜舟村内腾空而起。王营长带领的突击队乘敌不备，由南向北突然猛攻敌人背后，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张兴林和胥印候指挥坚守部队，从北山和东山向敌发起攻击，积极主动协同增援部队围歼敌人。匪特被四面包围起来，走投无路，四处乱窜，无处藏身。

这时，姜舟村内外冲锋号音和杀声连成一片，战士们的欢呼声和“缴枪不杀！”“举起手来！”的喊杀声回旋在村子上空，涣散的匪徒纷纷投降缴械。匪首们见大势已去，仓惶向卡吉、铁匠村方向逃窜，立即被我堵击部队截回，姜舟之敌全部被歼，总指挥王姚氏被生擒活捉。

